

目 录

- 喀喇沁旗行政区划变革情况
.....《旗志》办公室供稿 周旭辉整理 (1)
- 深山里密送情报, 被捕后死里逃生
.....于治祥口述 沈相成整理 (5)
- 王爷府地主武装劫打八路军炮兵旅事件
.....木 斯 吴国辅 (14)
- 旺业甸区小队被袭击的始末.....赵振德搜集整理 (18)
- 顽匪伊相臣覆灭记
.....钱玉珩 赵振德搜集并整理 (23)
- 浩气长存——记小牛群区三位区长的牺牲
.....安玉林忆述 亢立先整理 (36)
- 壮烈牺牲的霍主任.....汪宗一 (46)
- 日本经营的喀旗大西沟莹石矿.....阎桂芳 (49)
- 满洲国在喀喇沁旗旺业甸实行集家并村的罪行
.....赵振德 (51)
- 满洲国蒙古王公土地奉上.....木 斯 (58)
- 贡桑诺尔布.....吴思和 邢复礼 (67)

转自《内蒙古文史资料》第一辑

附：①喀喇沁部扎萨克历代晋封情况

邢瑞峰供稿

②喀喇沁部扎萨克王品级多罗杜棱郡王

世袭表

邢瑞峰供稿

③贡桑诺尔布和福晋善坤及日本女教师
河原操子合影 文物管理所供稿

④贡桑诺尔布和日本官员合影
文物管理所供稿

⑤王爷府遗址照片 文物管理所供稿

崇正学堂.....汪宗一 (87)

附：①崇正学堂开学典礼合影
文物管理所供稿

②毓正女学堂开学典礼合影
文物管理所供稿

③喀喇沁留日学生在东京与日本教师合影
文物管理所供稿

④日本女教师河原操子送毓正女学堂学生
去东京入学合影 文物管理所供稿

特睦格图——蒙文铅印的开创者.....纳古单夫 (93)
《转自中国蒙古史学会论文选集》

喀喇沁王组建的“燕貽堂”戏班.....阎桂芳 (105)

喀喇沁王爷府杀虎营子(四十家子)由来
.....阎桂芳 (108)

龙泉寺简介.....郑瑞峰 (110)

附：①龙泉寺全景照片.....文物管理所供稿

②石狮子照片.....文物管理所供稿

③龙泉寺两方元代碑文.....文物管理所供稿

④赞龙泉寺诗文十一首.....郑瑞峰供稿

喀喇沁旗行政区划变革情况

旗志办供稿 周旭辉整理

喀喇沁旗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西南部，地处七老图山脉东麓。自清朝初期设立旗治以来，随着历史的更迭，几经变迁而形成了今天的喀喇沁旗。

清皇太极天聪九年（1635年），喀喇沁部者勒蔑系第十四代首领苏布地内附清朝，其子固鲁思奇布授扎萨克（旗长）。统领喀喇沁右旗，共四十四佐，驻锡伯河北，隶属卓索图盟，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因喀喇沁右旗族属繁衍，清理藩院命在右旗领地内另辟喀喇沁中旗。喀喇沁右旗，俗称喀喇沁王旗。总面积一万二千五百平方公里。喀喇沁右旗王府原建于锡伯河畔的龙山，康熙九年（1670年）迁至王府（大营子）。清雍正初年，设热河厅、八沟厅（今平泉），喀喇沁右旗属八沟厅统辖，地处八沟厅的北部。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改热河厅为承德府，另置热河道，八沟厅改为平泉州。光绪三十年（1904年）辟喀喇沁右旗东半部，增设建平县（包括平泉县的北部、建昌县的西部）。

民国年间，北洋军阀为了阻止蒙古王公的独立，在维持清代对蒙古王公的封爵，发给俸禄的同时，在统治权力上效法清朝逐步削弱蒙古王公上层势力的政策，民国三年（1914年）设置热河特别区（即原昭乌达、卓索图盟之地

域)，並在其境内大量设立县治，实施废旗设县。将今喀喇沁旗全部和平泉县（喀喇沁中旗）北部设大宁设治局，后改为宁城县，隶属热河特别区。

伪满初期，实施旗县复合制，即旗县并存，一地两主（蒙人归旗、汉人归县）。在设建平县的同时，又设喀喇沁右旗，县公署设在老建平，旗公署设在王爷府。这样，使同一区域的旗与县自成一行政系统，分人而治，形成了旗与县并存的局面。伪康德七年（1940年）又废除旗县复合制，实行旗县合并，取消县治名称，将民国二十年（1931年）划归宁城县的喀喇沁右旗西半部和旧建平县统合为喀喇沁右旗，伪旗公署设在平庄。其地域包括建平县全部，喀喇沁旗全部，隆化县的七家、承德县的五家，均属喀喇沁右旗。其东界土默特右旗（朝阳）敖汉旗、西界围场、隆化、承德三县，南界喀喇沁中旗、喀喇沁左旗，北界翁牛特右旗（赤峰）。总面积四万一千二百二十七平方华里。下辖三十二个行政村。

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冀东分区于一九四二年在长城以北，曾建立承平宁联合县，下辖八个区，当时右旗属第八区，即特八区。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党领导下的人民政权相继建立。热河省先后成立了热中、热北、热辽专署，喀喇沁右旗隶属热中专署（第十九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同时将伪喀喇沁右旗改为建平县，县政府仍驻平庄。

一九四六年二月，划建平县为建平、喀喇沁右旗两个旗县，以马鞍山、毕家坝为界，东部属建平县，西部属喀喇沁右旗。同年九月，热河省政府鉴于喀喇沁旗蒙、汉杂居的情况，实施了蒙、汉分治，在设旗的同时，又在喀喇

沁右旗设建西县，旗县政府所在地设在王府，建西县所辖王府、公爷府、旺业甸、罗营子（牛营子）、小牛群、克勒沟六个区。同时为了适应解放战争形势的需要，将建平县的西部（老哈河以西、马鞍山、毕家坝以东）建立建中县。建中县辖平庄、乃林、楼子店、西桥四个区。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热河省政府令建中县合并于建西县，旗县政府也合并在一起，取消蒙汉分治，改为喀喇沁右旗建西县联合政府。一九四八年春，旗县政府从王府迁至公爷府（锦山）。全旗共划九个区，二百二十三个行政村。同年十一月三十日，热河省政府宣布撤销昭乌达政府、热中、热辽专署。一九四九年三月，热河省委将昭盟南部地区的联合政府和合署办公的形式加以调整。喀喇沁右旗建西县联合政府遂改为喀喇沁旗政府。五月又改称喀喇沁旗人民政府。

建国后，一九五〇年全旗除仍设九个区外，将行政村合并为一百七十三个。一九五四年，旗人民政府改为旗人民委员会。一九五六年一月，热河省建制撤销，热河省下属的宁城、赤峰县、喀喇沁、敖汉、翁牛特旗、乌丹划归内蒙古自治区昭乌达盟。同年春，喀喇沁旗开始第一次撤区划乡，共划为一个镇、五十个乡。一九五八年四月，第二次划乡，全旗又划为二个镇、二十二个乡。同年秋人民公社化运动，又将乡级机构改建为二十二个人民公社。年底，将平庄地区的平庄、五家、太平地、美丽河四个公社划归赤峰市。一九六〇年二月，全旗进行并社工作，将原十八个公社合并为九个。后又在原九个公社的基础上新划出七个公社。一九六四年七月，盟决定将原喀喇沁的马蹄营子公社、什大份公社（后改为山前公社）从赤峰市划回。至

此全旗共有十八个公社、三个农牧场，行政区划基本稳定下来。东界老哈河与建平县相邻，南靠宁城县，西与河北省围场、隆化两县接壤，北与赤峰市、赤峰县毗邻。东西长约一百零四公里，南北宽约七十五公里，总面积为三千二百三十三平方公里。

一九六九年八月将昭乌达盟从内蒙古自治区划出，归属辽宁省。喀喇沁旗隶属辽宁省昭乌达盟。一九七九年一月，又将昭乌达盟划回内蒙古自治区。至一九八三年内蒙古自治区对盟市机构进行了改革，十月撤销昭乌达盟，将原昭乌达盟所属旗县划归赤峰市管辖。同时将喀喇沁旗山前公社，马蹄营子公社的公格营子、西六家、四家、喇嘛地、岭上五个大队，楼子店公社的乔家窝铺大队、甸子公社的望甘池、昌盛远二个大队并入赤峰市元宝山区。一九八四年初，随着全国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我旗取消了农村人民公社的建制，建起了乡、镇级管理机构。全旗共划分十六个乡、五个镇及乃林果树农场。

深山里密送情报 被捕后死里逃生

——忆我在抗日战争中的生活片断

于治祥 口述

沈相成 整理

当杨润田我们俩谈到当年在抗日战争中的经历时，往事象潮水般涌上心头。

抗日战争发展到一九四二年，八路军逐步深入到我们这偏僻的山区，利用军事上的有利地形开辟根据地。宝石沟山高路险，丛林密布，是公爷府至宁城的交通要道之一。日本鬼子利用汉奸、特务到处搜查共产党、八路军，弄得人心惶惶，形势非常紧张。我们宝石沟当时只住着五户人家，靠着山林，是个僻静地方。可是，在这里却发生了一些不平常的事情。

就在这年腊月二十七的晚上，已是夜深人静了。

“老乡”！门轻轻地响了一声。

我忽听有人叫门。定了定神，心想这么晚了，有谁能到这死山沟里来呢？我打开门，在黑夜中隐约看出当院站了二十来人。

一个人小声问：“老乡，你姓什么？”

“姓于，叫于治祥。”

“宝石沟只有这几家吗？”

“就这几家。”

“你们这来过八路军吗？”

“没有”。

“你看过八路军吗？”

“没看过。”

“我们就是八路军，到这里是开辟地区来了，中国就要解放了。我们还没吃饭，还要在这住下，请你给安排一下，行吗？”

我答应后，领他们到院外，一看，两排整齐的队伍站出老远，约有一百来人。啊！还有这么多呢！我领着四、五个人，到那几家去叫门安排住宿。安排好后，我们一家人为八路军准备饭菜。饭后，其它同志都休息去了，刚才和我问话的那个同志，把我叫到里屋套间。屋内有四、五个人，叫我在一旁坐下，开始问起情况来。

“这地方有多少大户？”

我从四十家子到桥头湾子，用手指掐着点了有十二、三户。

“这离公爷府多远？”

“三十里。”

“公爷府有那些兵？”

“有警察署、国兵、日本宪兵队。”

“他们都有多少人？”

“我知道的警察署十五、六人，国兵一百二、三十人，宪兵二十来人。”

然后，他打开地图，在上面划了几笔，又说：“你能不能弄到公爷府河南的地图，如能弄到，我们来人给我捎去。”说完，又画了一张草图，说了几句要我以后多帮

助八路军办事的话，就休息了。

第二天早饭后，这个同志又把我叫到里屋说：“我们打算在这过年，看来这个村住处比较困难。”又把地图打开问：“樱桃沟这地方你有没有可靠的人？”

“有。”

“能不能联系让我们住一下？”

因为没有十分把握，只答应去联系。于是，上午我就翻山越岭到樱桃沟朱昌虹家。我和朱昌虹来往关系比较密切，他是那个甲的甲长，和公爷府的警察署、国兵、宪兵队都有些联系。我到他家后，就直截了当地说：“有一批八路军到咱这开辟地区，是全武装，一百二十多人，打算在咱这过年，因我家住处紧张，看你能不能帮助解决一下？”

朱昌虹很有把握地答应：“行！弄好吃好，弄赖吃赖，吃好吃赖原谅点，在这出了事我负责任！回去向部队说，叫他们放心。”

我走后，他就到公爷府去，靠着一张巧嘴，说有八路多少多少，怎么怎么厉害，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又是威胁，又是利诱的背着日本人弄来了不少白面和一些其他东西，准备给八路军过年。

我回来后，把到那联系的情况做了汇报。这年正好是腊月二十九过年。我带领一百二十多名八路军在二十八的夜里，把部队送到朱昌虹家。正月初一的晚上，已将近半夜了，部队回到我家。第二天晚上，他们要趁着黑夜往南走。这个同志把我叫到里屋，说：“我叫黄云，我们以后要安排一部分人到这来找你，请你多帮忙。”以后我才知道他是杨雨民。並给留下近一千斤粮票和一封介绍信说：“把

他保存起来，等解放后交给当地政府。”

他们一走，很快过去了十多天。一天晚上足有一更多天，又有人叫门，我开门后，见是九个便衣同志。一个年轻的同志问我：“你姓……？”似乎有意把声音拉长，然后停了下来。

“我叫于治祥。”

“黄云派我们来，找你执行一个锄奸任务。”接着问：“公爷府有特务吗？”

我向他们介绍有个叫吴树林的特务，无恶不做，家住在小庙子。他又接着问：“你小庙子有熟人吗？”

“没有，嘎巴沟史东碧是东沟史东坡的本家，和小庙子熟悉。”因为他们行动很急促，我立即把他们送到史东坡家，又向史东坡介绍了情况。接着，史东坡没有再耽误，派人把他们送到嘎巴沟史东碧家，史又把他们送到小庙子。

吴树林被包围后，先发制人，开枪打伤了一名八路军，他逃跑了，战斗完了，发现打死了他的老婆。这名伤员开始在史东碧家养伤。由于情况多变，形势紧张，只住了三天，我们又把他悄悄地转移到史东坡的沟里的一间小屋里。就在这天，他们这几个人又来了。那个负责人自我介绍说：“我叫刘艳民，那天没有来得及和你细谈，我们晚上就走，过几天给你来信，请你多帮忙。”

他们走后，我们两家买药请医，送水送饭，用心调养。话真不假，第三天的下午，从宁城县来了一名便衣同志，到门口就问：“于治祥在家吗？”

我正在院里，一抬头，见是一个陌生人，便迎到门口，“你有事吗？我就是。”

“那我们到院里谈吧！”

刚领进屋，他就说：“刘艳民写了一封信，叫亲自交给你，让你转给伤员。”说完，没站脚又走了。我立即把信送到了伤员那儿。他看完后，马上又写了一封，叠好后说：“请费力把它面交给刘艳民。”

这时太阳已经偏西。我又立即往宁城县大北沟子送信。刚进村，见到一个人，他有意打马虎地问：“干什么来了？”

我认真地回答：“听说杨先生在这，小孩病了，我给小孩请先生。”

“杨先生昨天还在，今天已经不在了。”

“那我到范廷那串个门。”真巧，到那就找到了刘艳民，那时范廷不在屋，我就顺手把信塞给了刘艳民，这时范廷进了屋，我搭讪着：“我来请先生，顺便到你这串个门。”这时太阳已经要落山。我张罗着要走，刘艳民在一旁装做不认识，并盘问我，不让我走。后来我假意找范廷当保，范廷满口答应说：“这是个老实人，出不了差错，出了事我担着。家里还有病人，快让他请先生去吧！”回到家都已经上灯了。就这样，为八路军送完了第一封信。

十多天后，这个伤员还没痊愈。四十家子于治星又突然捎信说，情况紧急，要赶紧把伤号转移到别的地方去。我就赶紧把这位伤员转移到小玉皇顶李万良家，养好伤后，回到部队去了。

从那时候起，我们家就成了八路军秘密联络点，我也自然成了秘密交通员。他们经常在夜间来往。八路军的小股部队有时也在这路过、吃饭、住宿。那几年，家里虽然来过的人不少，但真正熟悉认识的却不多。后来我才知道

杨润田、田会等领导同志都到我家来过。

那年二月中旬，一个名叫高桥的干部带领七十多名八路军来到这里，他们的无线电台没电池了，我就立即去公爷府买了二十多节电池给他们带走了。他们每次来，都要为他们传送信件和办一些事情。往南到宁城县大北沟子和黑山沟刘瑞庆家，往东一般是史东坡家，有时也到樱桃沟去，都是单线联系。信件大都放在帽沿、鞋帮或衣袖等不易被人发现的地方。他们来了，有时一住几天，我就要天不亮把他们送到山上，白天送饭，晚上往回接。用木棒敲树桩做为接头信号。他们最短几天来一次或一天一次，最长一个来月来一次。直到一九四三年八月他们走后，不知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一直两个月没有来。由于抗日战争的形势不断向前发展，日本鬼子越来越暴露他们的狰狞面目，活动越来越频繁，我们的心里时刻都在挂念着他们。

数九寒天的冬至月，一个深夜，北风呼啸，吹得山林沙沙作响。

“老乡？”

又有人叫门，我们全家人的心情又喜又惊。我小心地开开门，在夜幕下，模糊不清地看出是七个人，都是便衣。进屋后第一句话就轻声问：“你叫于治祥吗？”

“是我。”

“刘艳民到你家来过吗？”

我犹豫了。那个象个负责的人说：“刘艳民叫我这来找你，以后我们要经常来，找你办很多事，请你多帮忙。我叫崔亚周。”我这才放下了心。我又以串亲家、看朋友和办事等名义，给崔亚周他们传送信件。到了五月，又给他们每人买了一双胶鞋。

这里虽然没有炮火连天的战争，但白色恐怖更使人不得安宁，日本鬼子残无人道，汉奸、走狗卑躬屈膝，多少人生活在死亡线上。转眼之间到了一九四四年的八月。十三日的这天晚上，崔亚周带着七个人非常急促的来到我家。背后还多了一个背大刀，叫李武一。他们带了五支枪。崔亚周对我说：“现在情况紧急，我们要回承德，形势的需要，我有可能到宪兵队去，如果有事可写信联络。今天把枪藏在你这，过三、四天我们就来拿。”说完，就急匆匆地走了。第二天夜里，他们就把枪取走了，李武一没有来。告别时崔亚周只说了一句话：“以后办事要多注意，多加小心啊！”

八月二十一这天上午，我正在场院里搬谷子，往外一看，一眼就认出是李武一带着四个宪兵，大摇大摆地来到场院，我顿时预感到灾难即将临头。

一个宪兵气势汹汹地问：“你姓啥？”

“姓于。”

“你是于治祥吗？”

“是。”

“就是他。”李武一在一旁说了一句。

我轻蔑地向这个无耻叛徒瞥了一眼，接着就把我弄回家。一进当院一个宪兵厉声喝问：

“你把八路军的枪藏到那去了？”

“我没有藏枪！”

李武一声嘶力竭地喝道：“还想抵赖！”

四、五个人个个手持棍子、木棒等东西，劈头盖脸向我打来。一直打得头破血流，头晕目眩，栽倒在地上。他们乱翻了一阵，没有捞到一点东西，然后把我带往公爷府

日本宪兵队，没走多远又挨了两顿毒打。我被抓走后，我父亲唯恐这些强盗再来抄家，就把几年来存下的一千八百多斤粮票和杨雨民留下的介绍信，都烧掉了。一家人不知我这一去是死是活，心急如焚，肝胆欲裂，也没想出什么营救办法。

这天晚上，我进了宪兵队审讯室这座人间地狱。日本鬼子浅仓坐在前面正中，两旁站有十来个人，个个手持鸡蛋粗的藤子棒，带着满脸杀气。浅仓哇啦了几声，这群汉奸走狗们就象恶狼般朝我扑来，拼命抽打；不一会儿我就昏了过去。直到半夜，我慢慢苏醒过来，已是遍体鳞伤，身上穿的一件夹袄和血肉粘在一起。他们仍然和我要枪。这时我想起崔亚周临走时说的话，我就对他们说：“枪已经叫崔亚周送到承德宪兵队去了。”那个强盗浅仓给承德宪兵队挂通了电话，哇啦了一阵，才把我拖进一间小屋里，带上了沉重的手铐、脚镣。后半夜，就是刚才打过我的汉奸蒋宪补值班。我筋骨疼痛，饥渴难忍，向他耍水喝，他又踢了我一脚，打了我十来个咀巴子，又打得口鼻冒血，就这样挣扎在鬼门关上。在短短的七天内，受尽了残酷的折磨。七天后，汉奸蒋宪补推开门，漫不经心地说：“回去吧，今天放你了！”宪兵队做饭的段师傅把我搀到公爷府街上我的姐姐姜海川家，家里才把我接回来。我整整在炕上瘫倒了两个月另二十天，终于死里逃生了。

从那以后，我就和这些八路军失去了联系。文化革命后，听说杨雨民同志在河北省工作。一九七九年二月，我到他家去探望时，不幸的是，杨雨民同志已经去世了。杨润田同志接待了我。分别了三十四年，又见面了，我们的心情多么激动啊！他深沉地说：“宁、平、承、柳条沟地

区都是我们的老革命根据地呀。”他说到这，我心潮翻滚，是啊！终于解放了，我们的罪没有白受，我们的血没有白流，想到这，情不自禁地沉浸在辛酸的往事之中。

王爷府地主武装 劫打八路军炮兵旅事件

木 斯 吴国辅

一、劫打炮兵旅的前因：

一九四五年东北解放祖国光复，这是广大人民群众梦寐以求的大喜事，无不欢欣鼓舞。而出生在王府一带的伪官吏也从四面八方逃回家乡，聚拢在王府东大仓院内。这些人感到日本人赐给的宝座已经倒台了，又把未来的官运寄托在蒋介石身上。这些人野心很大，但目光短浅，根本看不到祖国光复后的革命形势。他们的阶级本性决定了他们的实际行动，以陈子善为首组织维持会。他们委派张麟阁专听南京消息，认为南京政权是天经地义的正统。国民党中央军是国军、是正规部队。以南京的指令行事，搜罗各种反动人物、壮大自己的势力，争夺革命胜利果实，企图等国民党中央军来接收时，摇身变为国民党的官员，“维持会”的成员以陈子善、吴××、邢××等伪官吏为骨干，以在王府驻防的伪洪奇部队遗留的枪支弹药作底本，搜罗了惯匪头子于老八（父子兵）、包××等三十多人为“维持会”的武装力量。例如鲍振中、于老八腰挎二八盒子枪，出入在王府东大仓院内。不久，建西县委派曹庆仁、刘彦春到王府建立区政府。陈子善等人一看事态不

妙，就赶快派人去赤峰第一行政督察专署联络，表示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专员王新华，地委书记黄文、宋诚，根据当时的形势，委派陈子善为旗长，并赠送一面锦旗，上写“蒙民之光”四个大字。正当陈子善参加专署会议的时候，鲍振中、于老八勾结小牛群土匪头子许六指（称为许团长）袭击了王府区政府，陈子善对此事件，听之任之、熟视无睹。在实际行动中暴露了陈子善等人的本来面貌。从袭击区政府后，陈子善等人就死心塌地与共产党对抗，积极召集地主商量对策，並造谣说：“刘区长带队伍要回来报复，要抢大户等”，所以伪官吏、伪警察纷纷出动，拼凑了一百二十多人的地主武装。

二、劫打八路军炮兵旅的经过：

据给炮兵旅带过道的群众回忆，炮兵旅从黑水来去承德路过王谷府。大约有八百多人，一百多辆大车、前头是八个骑大洋马的尖兵，接着有马队、步兵。有四个大洋马拉的大炮。迫击炮、炮弹都在大马车上载着。还有一部份伤员。据杨树林崔永财介绍，他们三个大车去五家给地主李庆武拉煤，被炮兵旅截住给拉炮弹。炮兵旅是从毕家坝过来的。腊月十七日住在小府，腊月十八日早五点来到喇嘛地被截打的。

陈子善劫打炮兵旅事先就有准备，头五天就作了部署。腊月十七日晚于老八带领二十几个人就住进杀虎营子。腊月十八日早五点左右又派去马队七十三人，每人发给三十粒子弹，一条白毛巾，扎在左臂上为标志。一百二十几人放三道卡子截打。第一道卡子在买卖街西山头，有三十多人，由包××指挥；第二道卡子在槟榔沟梁顶，有四

十多人，由鲍振中指挥。第三道卡子在杀虎营子后山有三十多人，由于老八指挥。杀虎营子甲长辛××负责联络。

腊月十七日炮兵旅即向陈子善等人联络。由辛××把炮兵旅借道路过王爷府的信件亲自交给陈子善、吴××等人的。他们见到信后，立即部署截打。

腊月十八日早七点钟左右，双方接火了，从下瓦房方向传来了炮声。王府街里和大营子的群众们都恐慌不安，人们听见炮声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家家关门闭户，大部份人都躲避起来。当时炮兵旅不了解地理环境和地主武装的人数、武器配备情况，所以只在杨树林西坝沿上支上迫击炮向买卖街西山头开炮。据当地群众说：“炮兵旅支了五门迫击炮和二门山炮。大约放了一百多发炮弹”。此时北窑地主刘××、刘××、温×、任××四人手持着枪，向我军阵地冲过来，被炮兵旅一炮就给打散了。

战斗开始，炮兵旅尖兵、马队以买卖街的坟丘为掩体开始还击，大约战斗了八个小时，仍没有攻下山头。正当此时由杀虎营子的陈德福带领炮兵旅两个排，从和尚地沟进沟、绕道上了南山，从南梁顶上冲下去，抄了后路。地主武装只注意了东边八路军的行动，战士们悄悄地爬到敌人背后，只用几个手榴弹就打散了敌人。当时包××这道卡子三十多人只顾逃命不敢抵抗。被打伤的有七人（事后死亡四人），其中有岗子杨运芳（乌勒巴图）雇的两人（一个姓康、一个姓韩、杀虎营子人）。在日落前打开第一道卡子后，其它两道卡子自行溃散逃命了。

炮兵旅在晚八点左右，进入王爷府，当天住进旺业甸。

三、事件的结局：

这支炮兵部队的山炮、野炮、迫击炮等武器，是从东北投降的日本军手里接受来运往关内以应战争急需的。当时我军还不能生产这种重型武器，所以对每发炮弹都十分珍重。但遭到截击之后，不得已被迫发射了一百二十多发炮弹，另有两名战士牺牲。

被迫给地主充当炮灰的人中，经过这场截击战，伤了七个人，其中死亡四个人。这场悲剧完全是陈子善一手导演的。而陈子善等人在事件之后，依然若无其事地拼凑他的老班底，成立喀喇沁右旗政府，自己当上旗长、科长等职，似乎一切与他们无关。直到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五日，这个心怀险诈的首犯，才被拉下台来，依法判处死刑。其他要犯如鲍振中、张麟阁、叶××、考××、辛××等人于一九五一年镇反时被镇压。当事者虽然得到了应得的下场，而劫打炮兵旅却成了喀喇沁的历史事件。

旺业甸区小队被袭击的始末

赵振德搜集整理

一九四六年十月初一日（农历），虽然是初冬天气，但北风吹得人们透骨冰凉。刚到晚上，天阴得象涂了漆一样，随着便是鹅毛大雪纷纷扬扬，霎时就变成了银白世界。当人们正在甜睡中，一声清脆的枪声划破夜空，紧接着轻重机枪、手榴弹就象开了锅一样炸响了。火光闪闪，人影幢幢，有的流血倒地，有的呐喊前进。枪声时急时缓，从破晓持续到傍晚才逐渐停了下来。这是一场光明进击黑暗的战斗，是革命战胜反革命的进攻战。就是这场战斗，被建西县武装支队把罪恶累累、不可一世的伊相臣匪帮彻底打垮，把隐藏在旺业甸区革命队伍内部的坏蛋彻底肃清，粉碎了他们企图里应外合、内外交攻，瓦解旺业甸地区革命政权的阴谋，把被劫持的丁庆林、陈发根、季宗富等革命干部援救出来，蓄谋已久的袭击区小队事件，到此全部结束。

一九四六年，虽然国民党中央军正处在到处进攻革命根据地的优势地位，但喀喇沁旗（当时叫建西县）已经建立起公开的革命政权。党把丁庆林、陈发根、季宗富等三名同志派到旺业甸区组建了区委、区政府和区小队。丁庆林任区委书记兼区小队政治指导员，陈发根任区长兼区小队队长，季宗富任区小队副队长。除了以上三名干部是上

级党委派之外，其他都是地方干部。区小队共七十三人，编为四个分队。一分队长马洪德，二分队长傅永发，三分队长邱广福，四分队长马山。另有司务长王国贤，上士（帮办伙食的）李树芝。区小队和区委为一个党支部，王国贤是支部委员。

一九四六年秋天，国民党中央军占领了赤峰、承德之后，在国民党的外围，又有些地主武装四出骚扰。当时在承德外围的地主武装要属伪警察出身的伊相臣匪帮最为猖獗了。伊是隆化七家人，他经常活动在隆化——围场——按丹沟一带。

就在国民党中央军占领了承德、赤峰之后，有些人对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被国民党貌似强大的表面现象糊住了眼睛。政治上的投机分子、革命队伍中的变节分子，纷纷蠢动了。当时参加区政府并任付区长的牛玉林和混入党内并担任区小队分队长的傅永发、支部委员王国贤等人勾结在一起，阴谋策划叛变，搞垮革命政权。他们常常利用党员身分窃取区委的机密，又利用他们的职务召开秘密会议。经过多次密谋之后，为了制造混乱，决定由尚永君（小美林人，当时参加建西县生产科，在旺业甸负责收大烟）私刻丁庆林、陈发根的手戳（因他会刻印章），假冒丁、陈的名义，给土匪头子伊相臣写信，表示愿意投降，归附于伊。又以伊相臣的名义给丁、陈写信劝他们弃共投降。伊相臣见到伪造信件之后，信以为真，便从草帽子梁进驻到按丹沟。当时区委机关、区政府、区小队驻在美林河南大营子。双方距离很近，形势很紧张。九月二十五日，王国贤伪造情报对季宗富说：按丹沟有三个人送信来了，土匪已进了按丹沟。他要求回去侦察敌人。季向区委作了

汇报，並派傅永发、王国贤二人回去了解敌人情况（因傅、王二人都是按丹沟附近的家，人情熟，地形熟）。为了防止敌人的突然袭击，区委召开了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了丁、陈、季之外，还有县政府来旺业甸区下乡工作的公安科员李唐峰，民政科长刘耀，县武委会主任林远。会上出现了两种分歧意见：季宗富提出乘敌人刚到，立脚未稳，立即袭击敌人。胜则胜，不胜即奔松树梁出王府大西沟向县支队方向靠拢。李唐峰坚决反对，理由是对敌情况不明，区小队势单力孤，前后没有依托，贸然行事，打无把握之仗，将要遭受重大损失。刘耀和林远基本上倾向于不打；丁、陈二人主张听上级指挥。最后议决刘耀，林远回县汇报，请求指示，李唐峰仍然留下协助区委工作。

傅永发、王国贤借侦察之名，行投敌之实，回到长林子便秘密和土匪勾结在一起，私邀匪首伊相臣在一家姓高的地主家里把区委、区小队的情况合盘托出，泄露给敌人，并向伊相臣讨价还价。

一九四六年农历九月二十六日（也就是傅王二人回去的第二天），傅、王二人从按丹沟回来了。这时区委等机关已转移到五家和岗子一带。傅、王二人一见到季宗富，便大肆张扬说，伊相臣是配合国民党来的，国民党已占领了围场，前锋已到达草帽子梁。伊把革命家属都捕起来了，参加革命的人不回去，就把家属杀掉……。

季宗富为了安定人心，告诉他俩不许再声张，另外，他认为公路是自己领人破坏的，国民党不可能来的这么快。正在这时北乌梁苏三节地的民兵又押送一个人来，说是牛区长叫送来的（牛玉林，本地人，当时担任副区长）。怀疑他是土匪。经审讯此人自称叫任凤超，是老实种地的

庄稼人。季宗富对任凤超这个名字很注意，因为他记得，有个土匪头子叫任凤超，经常活动在围场一带，于是他下令枪毙任凤超。押送的民兵对季说，牛区长不让枪毙，说是留着有用，这样，只好暂时收押。

事后查明，这完全是圈套。事实上任凤超是伊相臣为了随时刺探旺业甸党政军的活动情况而派进来的。傅、王已在伊相臣面前对任的安全作了保证。为了假戏真唱，欺骗区委，在傅、王二人从按丹沟回来第三节地又在程××家（程是地主分子，当时也参加了区政府工作）伙同牛玉林、程××等人设计圈套，利用牛的职务和地位来保护任凤超的。

九月二十六日下午，策反活动，已安排就绪，起事时间定为这天夜间进行。傅、王二人命令李××、王××、吴××、史××等由王国贤率领先抓季宗富，这样使区小队失去指挥，无法战斗（因季有作战经验，枪法也准，是区小队的主要指挥员）。傅永发率领赵××、马×等人抓李唐峰。然后合围丁庆林、陈发根。被害者无心，害人者有意。就在这天晚上，李××、王××等人，利用和季宗富同住一屋之便，抢了季的手枪，八个人把季捆了起来。傅永发、赵××等人，到了李唐峰的住处，赵就上去抢了李的枪，李唐峰这时才知道情况有变，他随即又夺傅的枪，赵××见势不妙，开枪向李射击，李当场牺牲了。季被俘后，大声叫骂：“贼羔子们造反了！”丁、陈二人听到枪声，恐怕情况有变，立即登上岗子的后山。乱匪们见丁、陈二人不在，就吹起事先规定的表示误会的口哨（一长一短表示误会，二长二短表示有敌情），丁、陈二人被诳了回来，同时被俘了。

当晚，乱匪们押着丁、陈、季三人，进北乌梁苏又到

×××家，傅永发亲自煽动不明真相的人去投靠土匪，随即进老虎圈沟过梁到了长林子和伊相臣汇合。在长林子被伊相臣编为“热北骑兵第一团第三连”。傅永发为连长，王国贤为副连长，其他有的任命为排长、副排长、班长等等。

伊相臣曾对季宗富劝降过一次，只要他答应三个条件便委任他营长：一、把区政府收缴的钱和大烟交出来；二、把旺业甸区的共产党员名单写出来；三、把给十六旅藏的一门迫击炮献出来。以上三条都被季回绝了。为了分化瓦解，伊匪对丁、陈、季都是单独监押。

九月二十八日上午，伊相臣以胜利者的姿态率领二百余名匪徒，押着丁、陈、季三人，得意洋洋地进了旺业甸。伊匪住在德盛恒药店，其他匪徒住在全镇各家。把丁、陈押在长发店，把季押在后水泉。

正当伊相臣意得志满、咀嚼胜利的时候，县委接到了丁庆林同志在最困难的情况下，写给县委的报告。县委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派县支队剿灭伊匪帮。十月初一日，也就是伊匪进入旺业甸的第三天夜里（这年农历九月是小尽），建西县武装支队剿匪的枪声打响了。经过半天一夜的战斗，匪徒有三十八人被击毙，匪首伊相臣也受了重伤。不得不在傍午时分仓惶溃逃。自作聪明的尚永君当场被捉获，在群众的愤怒声讨中，给剿匪牺牲的烈士们祭灵了。叛乱的组织者之一的牛玉林在事实真相大白之后，枪毙了。主要祸首傅永发、王国贤在五一年镇反时被查获归案处以死刑。丁庆林、陈发根、季宗富乘敌人混乱之机，被群众救了出来。这次事件从发生到结束，虽然仅仅五天时间，但在旺业甸人民通向幸福的道路上，却写下了永远值得记忆的一章。

顽匪伊相臣覆灭记

钱玉珩、赵振德搜集並整理

伊相臣是个罪大恶极、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在他罪恶的一生中，干尽了反共反人民的勾当，直到他恶贯满盈束手就擒之前，仅被他亲手杀害的我革命干部和群众就有五十四人，如果连同他授意或指挥下被杀害的在内，不下数百人。被他们抢掠的财物，就更无法计算了。遭他这股匪帮蹂躏的地域之广达隆化、围场、建西（后改喀喇沁）三个县，受害人数之多不下数万人。下面就把这个罪魁覆灭的前前后后叙述如下：

伊相臣是河北省（原热河省）隆化县七家乡古山人，出生于一个上中农家庭。自幼吃喝偷盗胡作非为，刚进入青年时期，“恶少”之名便遍及乡里。他身体健壮，禀性专横，稍不如意便打架斗殴，甚至致伤人命，都无所畏惧。他父亲曾多次劝导、教育、训斥、责打都无济于事。

一九三三年，日本侵占了热河之后，伊匪便投入日本人的怀抱当了警察，由于事敌如父，很受日本人赏识，很快就升为警尉补。一九四四年又派他担任茅荆坝警察分驻所长，把守这一交通要道。在此期间他练就了一手好枪法，惯于使用套筒枪和二号匣子枪。

一九四五年“八一五”日本投降后，伊相臣借着警察

分驻所的枪支弹药作底本，又招集了几个恶棍，狐朋狗友凑成二十几人的队伍，便干起打家劫舍、拦路抢劫的土匪勾当。我们党为了争取一切力量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也曾多次收服过他，并给予帮助和教育，想使他改恶向善、重新做人，但这个反复无常的家伙，总是贼心不死、出尔反尔。到一九四七年国民党十三军占领了承德、围场一带之后，他又一头扎进石觉（国民党第十三军军长）的怀里，被封为“热北骑兵第一团上校团长”，从此他指挥着全部人马不断向我隆化、围场、建西等革命根据地进犯，虽然每次都遭到我军民的坚决抵抗，但铁蹄所到之处，使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都蒙受重大损失。

一九四六年四月十四日，我旺业甸区委丁庆林、区长陈发根、建西县驻旺业甸工作队队长刘耀、县教育科员杨明、县政府干部吴昆山等人在旺业甸区古山村开会，研究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斗争问题，突然遭到伊相臣匪邦的袭击。他们团团包围了我工作队的住地，声言要全部活捉，不使一人漏掉。这时我工作队的几个同志在刘耀同志的指挥下，沉着冷静，凭藉着高墙大院灵活机动地迎击敌人。战斗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敌人靠着人多火力充足，对我方的包围越来越压缩了。刘耀等同志的子弹越打越少了，又加上多数是手枪，有效射程比较近，对敌人的威胁不大，后来只好集中在一间屋子里固守。战斗又坚持了一小时左右，敌人已压到窗前屋后，叫喊着要用手榴弹炸死屋里的人。这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吴昆山同志被敌人的子弹打中当场牺牲了。接着房东的儿子包罗又被土匪打掉了下巴。这时敌人把我方拒守的房子烧着了，我方的子弹打光了，刘耀等几个同志被俘虏。伊匪把他们绑到村外要枪

毙，这时古山村人民群众纷纷赶来，为刘耀等同志求情。敌人见人多势众，杀了他们怕惹恼群众，放了他们又不甘心。正在狐疑中，小美林有个叫梁晓川的人，出面调停，答应以四百两大烟为代价，换下这四个人。伊匪认为这样做既不伤害群众感情，又有利可图，于是叫梁晓川担保，才把这四个人放回来。

同年冬天，国民党军占领了承德、赤峰等铁路沿线和主要城市之后，伊匪的气焰更加嚣张。为了邀功国民党，积极拼凑自己的队伍。他和各地的地主豪绅、流氓无赖相勾结，攻打我地方政府，策划地方武装叛变，旺业甸区小队的倒戈哗变就是他一手制造的。他乘地方政权初建内部成分复杂的机会，和钻入区政府、区小队内部的牛玉林、傅永发、王国贤、程××、尚永军等人相勾结，里应外合，狼狈为奸，打死我公安科员李唐丰，俘虏了区委书记丁庆林、区长陈发根、区小队队长季宗富，使整个区小队七十三人下水，区委、区政府遭到严重破坏。

一九四七年，我们党为了配合全国性军事反攻，在解放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这是一场在政治上、经济上彻底摧垮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伟大运动。反动阶级预感到面临着灭顶之灾，但他们又不甘心失败，以十倍的疯狂、百倍的努力来做垂死的挣扎。一九四七年冬到一九四八年初我建西县也组成了以王铁为政委、张巴图、袁超、田致中、边朋越等人为领导的一百四十七人的土改工作团，深入到全县各个角落，发动群众斗地主、分田地，运动搞得热火朝天。就在这时旺业甸区三道沟门村的地主分子王森逃跑到伊相臣队里找他弟弟王焕诉说他家被斗和群众惩治他的情况。通过王焕又找到伊相臣，向他

许诺只要能为他报仇，愿将埋藏的几百两大烟献给伊相臣。王家弟兄这种宁赠匪首不与穷人的诺言，正中伊相臣的利欲，他立即把匪队分成两路，一路从东茅沟过梁出旺业甸四道沟往回包抄三道沟门，一路从坝底北沟过梁进旺业甸大店北沟，抄袭北沟、大店最后和三道沟门那一支会合。两股匪徒形成钳形，出其不意地袭击我旺业甸上半部的土改工作队，破坏我土改工作。

农历二月初六日，天刚破晓，两股匪兵便奔袭过来。因为三道沟门是袭击的重点，来的又这样突然，使我工作队员和该村干部群众来不及撤退，有九人被俘虏了。其中有土改工作队员王廷（小牛群罗卜旗沟人）、村干部李景云、张国华、常玉林、李万林、辛子恒、孙怀珠、张玉瓊等人。驻大店村的土改干部阎才，由于起得早，听到有马蹄奔跑声后，估计可能有敌人袭击，便躲到野地蒿草丛中，没被敌人发现。驻北沟村工作队员王青（上瓦房富余沟人）听到敌人进村，躲避已来不及，被房东高占才藏在外屋的破大囤里，上面放上许多破烂东西。土匪进屋一摸被窝还热，知道没有跑远便在院内到处搜查，一个匪徒往囤里戳了两刺刀，没扎到王青身上，人没搜到，便把高占才的妻子捆绑起来拷打逼问，高妻一口咬定不知道，始终没说出王青同志来，这才保护了王青。敌人在大肆搜捕之后便开始了公开抢劫，把三个村的牛马骡羊赶走许多，把贫下中农刚分到的衣物全部抢光，一时间鸡飞狗叫，人哭匪噪，真象乾坤颠倒妖孽横生一般。

王廷同志被绑到坝底羊草沟门伊相臣匪部（伊相臣这次没过梁）之后，因为有地主分子王森的告发，很快就和在坝底搞土改而遭捕的刘××、农会主任李××一起带至

七家河东给枪杀了。剩下的八个人，按王森的要求全部枪毙，但在伊相臣的亲信中，有个姓张的劝他不要树敌过多，积怨太深，莫如以每人五十两大烟为代价使其自赎。这个意见被伊采纳了，先放回四个筹措大烟，交够之后再放另外的四个，结果大烟没交上，那四个人被抓去当炮灰，直到这年的秋天隆化解放了伊相臣也自顾不暇他们才逃了回来。

多行不义必自毙。顽匪伊相臣的靠山国民党政府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都遭到了彻底失败，美国装备起来的八百万军队淹没在人民战争特别是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汪洋大海中。树倒猢狲散，伊相臣匪邦也就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这个嚣张一时自以为了不起的“英雄”，也不得不歔嘘哀涕叹自己的官运不通了。做不成官倒是小事，欠下人民的那么多血债，总不能不还。伊相臣从来没哭过，这回他哭了；对革命政权他从来没怕过，这回他不仅是怕而且怕得要死。他也想过跟定国民党跑到天涯海角，但事实告诉他比他大多少倍的兵团司令、战区总指挥都已经无地自容，象他这个小小的匪团长还有什么出路呢？他既无政治势力，又无金融资本，一个台湾岛屿哪有他立脚的地方。到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的身价不值一根毫毛。原来他把石觉给他的委任状看成金贴玉牒，觉得无尚荣耀，而现在却成了对自己的绝大讽刺和无情的嘲笑。形势、失败已经在伊相臣的心理上形成重压，使他呼吸困难，象缺氧的病人大口大口地喘着气。但更致命的还不是这些，几天之中他的队伍跑光了，有几个耐着面子虽然没跑，但老是问他要章程。他背上浸着冷汗，心中象着了火，嘴唇干裂了，眼眶塌陷了，声音嘶哑了，性情烦躁得

很，好象谁都惹着他，事事不遂心，但又不敢象以前那样发作官威。他饭吃不下，水也不想喝，只有鸦片烟是他唯一的营养和补充。他仇恨一切，恨自己为什么没早看出有今天，恨国民党为什么那样无能，恨革命形势为什么发展得这样快，恨共产党为什么那样高明。正当他问天无津、求地无门的时候，热河省公安厅发出了悬赏通缉令，无论任何人能抓住伊相臣的奖给小米两千斤，党政军干部抓住伊相臣的记大功一次。这个命令就象撒下的天罗地网，对他来说真是黄雀无他术，随时入网罗。他不敢再犹豫了，虽然他不懂得什么是政治，但卖主求荣的事他自己干过，也相信他手下的每个人谁都干得出来，与其留着这些人叫他们拿着自己的脑袋去邀功请赏，莫如赶走他们或许使自己多活几天。于是他假惺惺装出无可奈何的样子对尚在跟随他的人说：我的名声太大，跟着我没啥好处了，莫如有亲的投亲，有友的投友，自寻方便或许有些出路。有的人早怀去志，乘此机会便溜之乎也。最后只剩个刘振强因为家庭出身是地主成分，自幼游手好闲，土改后偷了人家的一条牛，害怕法律追究跑到伊相臣那里入了伙。到伊相臣落魄的时候，他也是外无至亲内无家小独身一人了，没有别的去处，只好暂时跟在伊相臣的身边。

在众匪徒散去之后，伊相臣虽然感到孤独，但总算卸下一个担子。他们躲躲藏藏，东游西荡，有时白天在山沟里隐藏一天，晚上才敢下山弄口东西吃。身边虽然还有点鸦片，但只能烫上几口或喝上一点儿，再想舒舒服服地躺在大烟灯前使用烟枪抽，已经不可能了。偶尔他们也冒险装成八路军到老乡家去找饭吃或找水喝，但由于自己的神态慌张，总避不开人们疑惑和探察的眼睛。他觉得这种目

光象芒刺一样刺入自己的骨髓，又象白骨精无论打扮得怎样婀娜多姿、娇态百生，但在孙悟空的眼睛里还是个骷髅一样。到这时他那种只身劫军车、匹马闯重围的所谓英雄本色早已失去了光彩，剩下的只是兔匿鼠藏侥幸求生的心理了。虽然他也不知道自己的名字早已记入阎王的新鬼录，但他还是怕死，甚至连想到“死”字的勇气也没有。他有时觉得内心非常空虚，空虚到连自己的存在与否都不知道，就象是天地混沌、万物无存似的；有时又觉得非常寂寞，寂寞到听见死神向他悄悄走来的脚步声。他一个冷颤接着一个冷颤，一声长叹接着一声长叹，那种为对手的胜利而嫉恨，为自己的失败而懊丧，为本身的罪恶而恐惧的种种无法分清的情绪，形成了沉重的绞索，套在他的脖子上，使他无力自拔。

一九四九年农历七月，伏雨下个不停。伊相臣和他的唯一伙伴刘振强象夜游神一样，昼伏夜行。一天，从坝底北沟上梁顺着茅荆坝的山脊走过韭菜楼来到了黑狐狸洼的尽沟脑。当他们刚走下梁来的时候，瓢泼大雨又下了起来。这时天已大亮，两个人便挤在一块大岩石下避雨。现在虽然说是盛夏季节，但在高寒山区山风夹着雨水打在他们的身上也是冰凉冰凉的，何况两个人早已饥肠辘辘。更要命的是仅有的一点儿鸦片于昨天就已用完，再加上天气反应，伊匪的烟瘾发作，使他痛苦难耐。好不容易耐到傍晚，雨也小了，他们才敢走上大道。绕过黑狐狸洼、小美林两个村子打算往按丹沟方向去。当他们刚走到古山的西头，伊相臣来了大便。不知是由于烟瘾发作而使他经不起这枪弹的压力，还是这些天来的患难与共使他相信了刘振强的忠诚，把自己的枪支和三袋子子弹全交给了刘振强，他

便进入一块包米地里去屙屎。等他便完出来时，这位唯一的伙伴不见了。伊相臣原来也没有想到会被抛弃，他喊了两声刘振强，毫无动静。这时，他职业神经质预感到又是一个致命打击，不由地一身冷汗出来了。开始他想可能刘振强隐蔽在暗处把枪口对准他准备开枪。如果是那样，只要第一枪打不中，他就向子弹飞来的方向猛扑过去，夺过枪来，反戈一击，便致对手于死地。他为了麻痹对方，窥测方向，争取尽可能取到的胜利，他假意用哀求的口吻说：

“刘振强，你是我的兄弟！都是我连累了你！要打，就给我个痛快的吧，往我脑袋上打！”

说完了听听，没有一点儿动静。这时他完全明白了，刘振强是携枪逃跑了。暗地打他黑枪的担心是多余的了。刚才绷得紧紧的神经立时松弛下来。这一紧一松。使伊相臣瘫痪了。烟瘾象破伤风菌一样啃噬着他每一根神经。他瞪大的眼睛，狠狠地骂了几句，究竟是在骂刘振强，还是骂自己的厄运，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他把眼睛又闭了一会儿，调整了一下神经，从地上站了起来。这时天完全黑下来了，关门大雨又泼了下来。他浑身沾满了泥水，象是刚从粪坑里爬出来的一头笨猪，又哼哼着上路了。沿着北面山根绕过古山村索性迈上公路往按丹沟走去。

他没敢进按丹沟村，从村南的河边上绕过去，来到村子的尽下头吴春起家。吴春起是他多年的好友，又是他砸刘殿元的明火、打死刘的妻子的拉线人，他想在他家躲躲总不会出漏子，何况他又是地主分子、为着拉线的事，还正在受着追究。

他来到吴春起的房前，听了听没有动静，他估计在这

样倾盆大雨中，是不会有潜伏、侦察的，就大着胆子走到窗前用不大不小的声音叫了一声：

“春起大哥！”

屋里没人应声。

“春起大哥！”

“谁呀？”

这一句小声的回问，使伊相臣熟悉地听出是吴春起的声音。

“是我，快开门。”

吴春起也听出窗外这位不速之客正是伊相臣。他没有立即迎进这位突然到来的难友，一个微妙的念头在脑海里闪过。他很快地把门开开，殷勤地让进了伊相臣。马上叫起老伴生火做饭，又把自己的衣服拿来给伊相臣换上。饥时一碗饭，恩重值千金。这一番热情接待使伊相臣感激莫深。没等问话，自己便把队伍被打垮，有家不敢奔，刘振强携枪逃跑，只剩他落拓一人的惨状全盘托出。吴春起极力安慰他，大骂刘振强忘恩负义不够朋友。吃过饭之后，伊相臣烟瘾难熬，叫吴春起给弄点大烟去，吴满口答应，表现得非常慷慨。在他去按丹沟买大烟之前，对伊相臣关切地说：

“为了安全起见，你得到我西厢房大囤里去休息，那里除了我家里人谁也不去，到时候我给你送饭。你就是住上一个月也不会出差错。”

伊相臣欣然同意。吴春起拿了被褥安排妥当，就把伊相臣藏进库房的大囤里。临走时把门反锁上就到按丹沟为伊买大烟去了。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未到，时间一

到，必然要报。就在伊相臣感念这位好朋友对他救困扶危的时候，吴春起的脚迈进了村长刘殿元的家门。因为刘家遭明火，几十两大烟被抢走，老婆被打死是吴春起拉的底线这件事暴露之后，刘曾要吴偿命，后来经过调解，要吴赔偿两石小米的损失。如果放到丰年两石米只不一千八百斤，未免太轻，但当时是灾年，这两石米即使吴春起倾家荡产也拿不出。

吴春起来到刘家时，刘殿元正在吃早饭。他一见吴春起，未免就有点怒火中烧，没有理睬他。吴春起强作笑脸凑上前去问：

“大哥，你还朝我要小米吗？”

刘殿元火冒三丈地骂道：

“他妈的，为啥不要呢！我不是早就说过了嘛，除非你交出伊相臣来，小米就不要了，否则，一粒也不许少！”

“当真吗？”

“当真！”

“那好吧，伊相臣现在正在我家，你赶快组织人去抓吧。”

吴春起把伊相臣从昨天晚上逃到他家来的详细情况和伊相臣说的话一古脑儿倒了出来。刘殿元一听惊喜异常，马上给了吴春起一块大烟，叫他回去好好稳住伊相臣，不许被他看出一点儿破绽，他带人随后就到。吴春起连声答应着就往家里走。刘殿元立即出去找区公安助理韩起亮和村支部书记兼武装小队长陈玉安。

在这里需要交代一下韩起亮为什么来得这么及时。因为伊相臣是全省著名的罪大恶极的匪首，他的匪队是国民

党军驻隆化的外围。解放隆化时这支匪军首先被我军打垮。他的残部一部分逃进东茅沟里沿着梁脊往东走到了旺业甸区的西南沟。企图在那里喘息几天再去宁城的北场子和小梁子一带。不料被旺业甸区在东局子下乡工作的钱玉珩同志知道了，他连夜跑回区政府作了汇报，并带来了区小队，打了个伏击战，击毙六人，伤十余人，这股逃匪彻底解决了。另一部分就是跟着伊相臣的这部分逃往隆化和建西县交界的山区。虽然这支也剩下伊相臣一人，但上级考虑到这个要犯一天不归案，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就要多受一天损失。所以省里除了到处通缉他之外，还派了一位姓任的军事干部率领一个连队追击他。因为按丹沟一带是他活动频繁的地方，所以区政府决定派韩起亮常住按丹沟随时搜捕他。

这天早晨韩起亮正从中官（按丹沟西营子）往按丹沟走，恰巧碰上刘殿元找他。谈了情况之后，立即分头去组织民兵。三十多民兵很快集合好了。带上火炮和长矛来到村外，韩起亮作了围捕伊相臣的战斗部署：由村武装副队长刘连元负责率领民兵包围吴春起的家，韩起亮、刘殿元、陈玉安三人进屋去捉人。韩起亮把仅有的五粒手枪子弹一粒推进枪膛，四粒压进弹仓。陈玉安也把三粒九九子弹压进弹仓，一粒推进枪膛。刘殿元把尖刀的木柄撤了又撤。三个人几个箭步跃入吴家的仓房。这时伊相臣刚过完烟瘾躺进大囤里去睡觉，乌亮的枪口和明晃晃的尖刀就对准了他的胸膛。随之又闯上四、五个壮实的小伙子鹰捉燕雀般把他提了出来捆个结结实实。伊相臣一见他们全副武装逼近自己，知道是末日到了，哀叹着说：

“这回完了！可惜我大江大海闯过了多少，没想到今

天叫你韩起亮抓住，我早认识你，安心要你死的话早就一枪打死你了，可惜我没那么办！”

匪首就擒，群情激愤，拳打脚踢，着实教训了一顿。押到按丹沟之后，刘殿元更是仇人相见，格外眼红，一顿棍棒打得他遍体鳞伤。都说伊相臣有解绳术，任何绳索都捆不住他。刘殿元怕他跑掉，用尖刀戳穿他的肩胛骨和脚卵筋，然后用一根八号铅丝穿上，两头判住，用钳子拧牢固，找了一匹白马驮上押往旺业甸区政府。

“伊相臣被抓住了！”消息象长了翅膀一样，很快传开了。人们拍手称快。热河省报《群众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这一消息。旺业甸区的人民群众奔走相告，一时间成为街谈巷议的中心话题。

热河省政府、热河省公安厅，对捉匪有功人员，分别给了表彰和物质奖励。

说到这里人们不禁要问：刘振强后来怎样了？据刘振强自己谈，他投伊相臣时，伊已开始走下坡路了。隆化溃败后，他就不想干了。这次他们往按丹沟川一来，他就在寻找逃走的机会。当他们走到古山村外的時候，他觉得山石草木都那么亲切，一股强烈的思乡感，总也摆脱不了，于是下定决心不再跟伊相臣跑了。正好这时伊相臣把枪支子弹交给他要去大便，他觉得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当伊相臣刚进地的时候，他就抽身钻进另一块包谷地，跑回自己的家乡——长林子。开始也不敢回家，想把枪和子弹掩埋起来自己再逃之夭夭。但又一想，既然脱开了伊相臣，还往哪里去？逃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反复琢磨，思想斗争很激烈。后来，才下定决心回到村里。把枪和子弹都交给村政府，村干部和韩起亮欢迎他回来，並告诉他说，

伊相臣落网，有你的一份功劳，为了争取你，区上已经开了三次会（区干部会、村干部会、群众会），会上决定一定保护你，争取你回来。过去一时错了不要紧，今后不错就行。希望你安心生产劳动，区、村政府决不会歧视你。

伊相臣在旺业甸押了十六天。这期间隆化、围场、建西三个县都要他去泄民愤。后经省里批准因他在隆化的罪恶最大决定把他解回隆化去正法。隆化和建西双方派出武装人员把他押到隆化公审完了处以死刑。这个双手沾满了人民鲜血的刽子手，至此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浩气长存

——记小牛群区三位区长的牺牲

安玉林忆述 亢立先整理

一九四六年春天，正是第三次解放战争的初期。遵照毛主席和党中央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我们旗建立了建西县人民政府，在县政府领导下全县开展了反霸斗争和减租减息运动。

小牛群是建西县第五区，当时这里的斗争十分复杂，当地土豪恶霸和土匪武装对抗党的减租减息政策，扰乱社会治安，破坏基层政权和支援前线的工作。

为了打开斗争局面，四六年四月，县委派常冶同志到小牛群区担任第一任区长。当时我在小牛群区政府当管理员。常冶同志是河北省青龙县人。大高个儿，长方脸，长得十分英俊，操一口河北口音，平素爱唱《忘不了》这首歌儿，他给同志们教唱的第一支歌，也是这首歌。

常冶同志到任后，带领区干部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开展了反霸和减租减息运动，迅速打开了斗争局面。

小牛群区黄家窝铺村有个地主叫张安庭，哥四个。他们在村里横行霸道，欺压百姓，对他家的长工心狠手毒，稍有不称心处，便用砖头、棍子、铁锨等毒打，因此，当地人叫他们“大红砖”“二红砖”“三把棍子”“四铁锨”。穷人没有不恨他们的。

常冶同志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发动群众，对这几个恶霸地主进行了坚决地斗争，使之威风扫地。这次反霸斗争在全区影响很大，振奋了士气，伸张了正义，点燃了埋在人民心中的仇恨火焰。

在日本侵略者投降后，国民党政府趁机抢夺胜利果实。一九四六年七月，国民党军队占据了东北三省，赤峰、围场一带也驻满了国民党军。当地的一些地主恶霸依靠国民党军队的势力，召集土匪、伪满特务、反动警察、地痞流氓等，阴谋策划，组织地主武装，对我革命力量进行疯狂反扑。

四六年八月初，国民党军大举进攻解放区，气焰十分嚣张。

八月上旬，我八路军同国民党军队在围场黄金地一带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战斗。战后，我一部份伤员被护送到小牛群治疗，护送伤员的部队是一个连。八月十二日，侦察员探知国民党军要进攻建西县，部队首长和区政府考虑到伤员的安全，决定把伤员转移到赤峰县后老府。为防止途中发生意外，区政府派出区小队同部队一起去送伤员，当天就出发了。

伤员转移后，区小队只剩下五、六人守卫区政府。当时区干部大部分下乡了，只留下常冶和五六个区干部。这十来人中只有五支大枪、三支短枪、子弹也不多，每支大枪有十粒子弹，短枪有五粒子弹。

这天，黄家窝铺地主张安庭，曾被我区政府斗争过的那个“大红砖”怀着强烈的复仇心，鬼鬼祟祟溜进小牛群街里，借到区政府交军鞋袜的名义，探听区政府的情况。他听说区小队全都护送伤员去了，在家的区干部也不多，

就立即回去找到地主吴凤，诡秘地说：“小牛群区小队都走了，区干部也没几个，只有区长和几个行政干部在家。你快到围场杨树洼，去找我的朋友张凤山、齐国民“团长”，让他们带着队伍来打区政府，给咱们报报仇，我们还能得一些财产（大烟、布匹等）”。吴凤秉承张安庭的旨意，在八月十二日晚把张凤山、齐国民的大团勾来了，约有四、五十个土匪，当晚住在张安庭家。

次日，天刚蒙蒙亮，土匪就包围了区政府。一场激烈的战斗打响了。在敌众我寡并被敌包围的情势下，常冶区长临危不惧，神情镇定，灵活机动地指挥战斗。最后，我们的子弹打光了，敌人疯狂地冲进院子里，常冶区长和在区政府收缴大烟的吕指导员及一名区小队员壮烈牺牲。区长牺牲后，我们几个人手无寸铁没有办法和敌人继续对抗，便冒着呼啸的子弹，从后院墙跳出来，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待我们的部队闻讯赶来救援时土匪已逃跑了。

这次被袭击，我们遭受了很大损失。除损失了大小枪六支、二百多斤鸦片、十三匹骡马和若干布匹外，区政府遭到破坏，区长牺牲了。

当天，县委组织部长张树德同志赶到小牛群、全体区干部和当地群众二百多人在小牛群南山，为烈士举行追悼会。

追悼会庄严肃穆。人们在抑制着失去亲人的巨大悲痛，肃立默哀。张树德同志致悼词，他沉痛地说：“常冶同志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地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继承先烈遗志，去完成烈士未完成的事业……”。

人们对敌人的暴行，怒火满腔，在烈士坟前庄严宣誓：要前仆后继，坚持小牛群区的革命斗争，直到把一切害人虫消灭干净，解放全中国。

从此，小牛群区的斗争烈火越烧越旺，人们组织起来，同敌人展开了游击战。

四六年十月，县委又派二十二岁的甄朋同志接任小牛群区区长工作。甄朋原籍河北省正定县南楼村人。一九四二年参加革命，在当地任抗日先锋队主任。四六年被调任建西县，第一区建联会主任。甄朋中等个儿，圆脸庞、好说好笑，会唱京戏，爱唱《王二小放牛》歌曲。甄朋到任后，发动群众，打土豪、斗地主，征集军粮军鞋，支援前线。

十月上旬，在甄朋区长的建议下，区政府把当地的土豪劣绅集中到小牛群街里，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布置征缴公粮、军鞋、军袜的任务。这些狗地主当面答应，背后搞鬼。他们认为国民党九十三军在赤峰，小牛群上下还有土匪、大团在活动，有恃无恐，手中有粮有物却一拖再拖，拒而不交。

十二月二十五日，甄区长在小牛群街里召集区干部开会，研究如何尽快征缴公粮军鞋，打击土豪劣绅。没想到狗地主利用叛徒刘德善、丁三瘸子做底线，勾来赤峰猴头沟以张琢为头子的百余名土匪包围了区政府。向我人民政权进行阶级报复。面对这种意外情况，甄朋同志指挥区干部进行了顽强抵抗，直到子弹打完，大家开始突围。突围中甄朋的右腿不幸被手榴弹炸断，血流如注，当即昏迷过去了。几个土匪踊上来，抓住了甄区长，把他吊在小牛群街一个井台旁的老榆树上。

在这次战斗中，我们二十一个区干部大部份没有枪支弹药，因而突围非常困难，当地群众，就把我们都掩护起来了。土匪看区干部都没影儿了，就到各家翻箱倒柜进行搜查，企图活捉我们。但由于掩蔽得严密，敌人的阴谋没有得逞。这伙土匪没搜到区干部，又回到街里井台上，残无人道地去折磨甄朋同志。先用皮鞭抽，继之用开水烫，边打边吼叫：

“你们区干部有多少人？区小队上哪去了？谁是共产党员？”

“就我是一个是共产党员，别的什么也不知道！”。甄区长威武不屈，斩钉截铁地说。

这群恶狼看从甄区长口里得不到什么，气急败坏，兽性大作，最后把甄区长带到小牛群街西头杀害了。牺牲时年仅二十二岁。

土匪逃走後，由建联会主任王云霄同志主持，在小牛群南山召开了百余人的追悼会。王云霄沉痛地说：“甄朋同志为了人民的利益，和敌人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烈士的鲜血不会白流，这仇恨我们一定要报，向敌人讨还血债！”。全体干部在烈士墓前举行宣誓：我们一定将革命进行到底，打垮国民党解放全中国！

一人倒下去，万人站起来。广大干部群众没有被敌人所吓倒，相反要求反霸、除匪的情绪更加高涨了。

在我们两位区长相继殉难后，建西县委分析了小牛群区阶级斗争的复杂情况，决定从二旅部队抽调一名有作战经验的干部任区长。经部队首长研究同意派班起云同志接任五区区长。班起云原籍北京市平谷县东窝村赵家务大队人，原名班中月。一九四二年参加八路军冀东抗日十三

团。四五年随部队来到东北，在热河省丰宁县改编二旅四团。四六年四月所在部队到建西县小牛群附近驻防，四六年十一月他从部队转入地方。

在两任区长相继牺牲的情况下，班区长怀着满腔悲愤，带领区小队和区干部机智勇敢地开展了剿匪斗争。在南台子，大沟等地，一连气打了几个胜仗，活捉了二十几个土匪，沉重打击了反动势力，推动了除匪反霸和减租减息斗争。

四七年三月十九日晚，班区长带领区小队，区干部和冀东来的武工队共二百多人，开往围场吊虎沟剿匪。我军出其不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吊虎沟打了一个漂亮的围歼战，活捉了六个土匪。

战斗结束后，大家吃罢饭，当夜在这里休息，准备次日清晨返回。黎明时分，我们的哨兵突然发现了国民党军队，这时敌人已经进了我们住的村子。霎时，枪声大作，敌兵吼叫着，我们意识到被敌人包围了。原来，吊虎沟有个恶霸地主，乘我军在这休息之机，夜里跑到围场县朝阳地，勾来了国民党九十三军一股部队共八百多人从东西南三面包围了我们。

在这紧急关头，班区长和武工队长指挥部队，边打边向北面的一座小山上突围，最后占领了山头。我军居高临下，子弹、手榴弹象雨点般在敌群中爆炸，击退了敌人的六次冲锋，敌人的尸体扔在了半山坡上。敌十三营营长被击毙，这一下，敌人乱了阵脚，不敢妄自向我冲锋了。这时，武工队长对班区长说：“敌人已退下去了，你带上二十名区小队员押着土匪先走，我们在这里阻击敌人”。班区长带领区小队员押着土匪向小牛群进发。班区长骑马押着

二个土匪走在前头，他的马快，不一会，落下区小队员二里多路。被班区长押的土匪心怀鬼胎，一路伺机逃跑，但未得逞。眼看到了水泉沟门，土匪忽然挣脱了绳索，恶狼般的向班区长扑去，班区长同这个土匪展开了搏斗，滚在一处。突然土匪抓到了班区长的手枪。枪声响了，班区长英勇牺牲了。后面的警卫员忽然听到前面响起枪声，打马往前飞奔。到了水泉沟门，见区长倒下了，那个土匪正在逃跑，警卫员在马上顺手一枪，结果了土匪的狗命。

我武工队和区小队在吊虎沟同敌人激战了两个多小时，我方伤亡很少，敌人扔下了五十多具尸体，狼狈地逃回去了。我区小队和武工队当日下午往回赶，走到水泉沟门，见班区长牺牲了，全体同志都摘下帽子向烈士致哀。有的同志抑制不住内心的悲痛，放声恸哭。晚上，大家把班区长的遗体抬到小牛群。第二天区干部、区小队和武工队二百余人在小牛群南山，举行了追悼会。在烈士墓前，大家缅怀英雄业绩，决心以先烈的英勇斗争精神，打垮国民党，剿灭土匪，把革命推向全国胜利。

班区长牺牲后，建西县委派组织部长张树德带领县支队、区小队和区干部，展开了全面剿匪斗争。在围场县，打垮了齐国民匪帮，活捉了齐国民，把他押回建西县枪毙了。土匪头子张凤山，被围场县支队捕去，在围场县克勒沟枪毙了。土匪头子张琢逃到关里，被我八路军活捉，押至河南省邯郸关押，被判处无期徒刑。这些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匪首，一个也没有逃出人民的法网，历史决定了他们必然覆灭的命运。

一九四七年，我八路军在剿匪取得全面胜利的基础上，发动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打土

豪，分田地，消灭了封建势力，人民群众从此翻身做了国家的主人。

解放后，我在小牛群任区委书记，为了纪念英雄，教育后代继承先烈的遗志，在小牛群后山建立了烈士纪念碑。每到清明时节，当地干部群众和学生，都去纪念碑前扫墓，祭奠烈士，汲取不断前进的力量。

结 束 语

上面我把三位烈士在小牛群区的光辉斗争事迹做了介绍，我认为还有必要而且应该把与烈士有关的一些事情补充介绍一下，使大家能够全面地了解烈士，学习烈士的革命精神。

当初，常冶同志调到建西县时候，他的妻子正怀着孕，后来生了一个儿子。孩子从小就没见到爸爸的面，天天盼望着爸爸归来。妻子和儿子四处打听爸爸的下落，但杳无音信。儿子长大参加了工作，当了人民教师。一九五四年，在热河省承德市政府的帮助下，儿子得知爸爸的一点消息。他来到小牛群公社，当时我在小牛群公社任党委书记，我给他介绍了烈士牺牲的全过程，并带他到烈士墓前悼念。常冶的儿子知道爸爸牺牲的情景后，悲痛万分。他眼含泪花，表示要继承爸爸的遗志，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共党为人民做出更大贡献。从此，我们建立了联系。这时，我们得知常冶同志的家属没有得到烈属待遇，我们联想到另外那两位牺牲的区长的家属是否也是这种情况，公社党委本着对烈士负责，对革命负责的态度，准备着手调查。这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直到一九七三年，公社党委研究决定，由一名书记负责组织两个调查小组，前往

班、甄二位烈士的原籍去调查落实。但是当时我们不知烈士的家乡，后来，一个偶然机会使我们弄清了班区长的原籍。

那是在一九七三年十一月，斗批改工作队进驻了小牛群公社。我向工作队介绍了小牛群在解放战争时期革命斗争历史，特别是三位区长的英雄事迹。工作队队员，盟农牧学院的李井瑞同志听了后，觉得对班起云这个名字很熟悉。经过回忆，很象他的邻居、战友——班中月。李井瑞说，他们俩个是一起参加革命的，后来因工作需要分开了。自从分手后从未见过面。解放战争结束后，李井瑞同志回到老家，而班中月却一直下落不明。七三年春节，李井瑞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个问题，回到老家取来了班起云的照片，我们一看，正是当年的班区长。这样，我们才弄清了班区长的家乡、地址。之后，我们去那里进行了调查。

班起云原名班中月，一九四六年春，他接到部队要往东北进发的通知，对父亲说：“我要到东北去了，此后我改名叫班起云，以后无论发生什么变化，就您自己知道就行了。”这样，他告别了刚刚结婚七天的妻子，匆匆离开家乡，随部队出发了。妻子在家等呀盼呀，一天天，一年年，总无音信。后来，他妻子抱养了班起云的一个侄女，母女俩相依为命，整整度过了二十八个春秋，她侄女勤奋学习，考上了清华大学。当李井瑞同志取班区长的照片时，他家才得知班区长牺牲的消息。

我们的调查组到甄朋烈士的家乡河北省正定县南楼村。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弄清了烈士的历史和家庭状况，原来，他的家属多年来是按失踪军人家属对待，没有享受到烈属的待遇。

我们调查结束后，把这三位烈士的生平事迹和牺牲经过由旗政府、旗武装部开了证明信，转到烈士家乡当地政府，从此，他们的家属才被确认为烈属。我们完成了应该完成的工作，心里也觉得豁亮了。

时光荏苒，三位区长已经牺牲了三十九年了。今年适逢建国三十五年之际，写出这段回忆，来纪念烈士。青年同志们，让我们学习烈士的革命精神，继往开来，在建设四化的征途上，跃马驰骋，胜利前进吧！

壮烈牺牲的霍主任

汪宗一

霍主任名叫霍金祥，又名保柱。原籍河北省。他出身贫苦，十几岁时父母相继去世。就剩下一个人给人家扛活凑月，维持自己的生活。后因荒年、兵乱，从原籍逃荒出走，经历十数年的讨饭、当苦工的苦难生活，在解放前不久，来到了喀喇沁旗大西沟门村落了户。

霍金祥劳动好，性情耿直，受到群众拥护和信任。解放后，清算斗争地主时总是走在前头，所以就被选为大西沟门村的农会主任。从此他对革命信心更增强了，立场更坚定了。他痛恨旧社会，饱尝了受压迫、受剥削的辛酸生活。解放了，政治上当家做主。经济上翻了身、生活有了保障，所以他不但积极参加了反霸斗争，还在支援前线的工作上表现很积极，按质按量地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因此，区政府把大西沟门村评为模范村，当然霍金祥也成了一个人人称赞的农会主任。

一九四六年，旧历腊月十八日，家家户户都已准备好过春节的年货，迎接减租减息反霸斗争后的第一个春节。这天，天蒙蒙亮的时候，就听见机枪声、大炮声连接不断。霍金祥同志身背着火枪，手提着战刀，去找付村长张岐山同志，他以为国民党匪军向我解放区进犯，遭到了我军反击而发生的激战。他当时毫不迟疑地同张岐山到村外瞭望，看见有担架走过来，因霍的眼睛视力不佳，将国民

党的担架，误认为解放军的担架，他上前说了声：“同志们辛苦了！”，于是接了担架抬着就走。后来张岐山看出是国民党军，张用中指暗示给霍金祥，霍才知道上了当。国民党匪军把他押到一个地主家。这时一个国民党军官走过来，一个士兵向他报告说：“活抓两名共匪干部，一个是清算主任，一个是村长”。匪军官命令士兵押起来。不久审讯开始了，把霍金祥同志吊在杏树上说：“你是农会主任吗？干部都上哪儿去了？”。霍主任毫不畏惧地说：“我是农会主任，干部就是我一个人”。

匪兵发怒了：“你要不说老实话，就打死你！”紧接着鞭棍齐下。霍主任咬定牙关说：“打死，也是我一个人！”。

此时一个满脸横肉，身穿皮大衣的军官，走过来制止拷打的匪兵，阴险地说：“你瞎眼模糊的舌头这么硬，难道你不怕死吗？”。霍主任怒视着敌人，厉声回答：“怕死不当干部”。阴险的敌军官又带出伪善地语气说：“你说国民党好哇？还是八路军好”。霍主任斩钉截铁地说：“八路军好，国民党遭殃军，国民党是卖国贼！”。敌军官又说：“只要你说一句国民党好，今后不再给八路军办事，就马上放你！”。霍主任像钢铁一样的坚强，依然说：“还是八路军好！不让给八路军办事，那办不到”。敌军官拷问了很久，他也没有说出国民党一个“好”字来。敌军官气疯了，一面大声叫：“你再说八路军好，就把你活活冻死！”一面指使匪兵剥掉霍主任的衣服，此时他早已被打得皮开肉绽，又开始从头顶上浇凉水，随泼随冻随鞭棍齐下。在此数九寒天，滴水成冰的时候，水随泼随冻，时间久了，就冻成一个身穿冰甲的巨人一样。但他在心脏还

没有完全停止跳动之前，口里还在说：“八——路——军好”。从下午到深夜霍金祥同志被折磨到已经体无完肤，凌晨三点钟，一颗赤诚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这位坚贞不屈的硬汉，英勇牺牲了。国民党匪军把他的尸体放在野地里，说是让狗来吃掉，但在第二天黑夜被广大群众把霍金祥同志的遗体偷到南山埋葬了。建国后，重新给霍金祥同志建了坟墓，並召开了一千多人的追悼会，历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学校师生都来为他扫墓，以缅怀烈士的功迹。

当时我正在崇正小学当教师，为了宣传霍主任坚贞不屈，壮烈牺牲的革命精神，接着胜利剧社“写的《硬舌头》剧本，组织师生曾到大西沟门、王爷府等处作宣传演出。从此，人人都称颂他是忠于党，一心为革命的“硬舌头”

日本经营的喀旗大西沟萤石矿

阎桂芳

大西沟哑叭沟萤石矿，日本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五年八·一五投降，整整经营了六年时间。

萤石的矿源发现，是在一九三九年夏季，据说日本人在赤峰一带河滩上捡到几块小萤石，认为是珍贵矿石。当时组成了三人勘察组，由日本人大森、朝鲜人小川、中国人朱智祥（翻译）三人，从赤峰开始沿锡伯河向上游寻找，直至大西沟门前就不见了萤石，即拐弯往大西沟里找。三人到王洪业家休息吃饭，说明了来意，由王找了牛倌陈万财做向导，从哑叭沟外山头到头道沟梁顶，勘察了几天，就发现了大量的萤石线，认为这是个资源丰富有开采价值的矿。当时日本的侵略战争，急需要冶炼用的萤石。大森等人即搬到王府大营子村于光华家居住，继续去哑叭沟边勘察、边设计。基本告一段落后，在一九四〇年春在王洪业家租借房屋设立了采矿的机构。群众习惯叫他“大柜”把日本人叫大森“掌柜”的。

采矿的具体作法：

（1）暴露阶段：一九三九年秋开始雇佣当地贫苦农民上山，从哑叭沟外山头到头道沟梁顶，每隔五十米左右为一段，在萤石线上挖槽两米长左右，深度把纯萤石暴露出为止。实际上是分段勘察，习惯叫法“挑山皮”。雇佣的劳力，自带铁锹、镐头，早来晚归，这样分段挑山皮就

干了六个多月，做工的农民就有八十多人，每日工资三角钱。

(2) 普遍暴动、普遍挖糟掘土挑山皮是从一九四〇年三月份开始的。成立了四个点，当时群众叫“把”，安置了住宿地点，操办了伙房，委派了工头(把头)，当时有二百余人。实际上这是全面挑山皮，彻底勘查埋藏萤石主线。

(3) 全面开采：一九四一年一月份开始转入正规开采。事先修建了十四间房子，除日本人大森总管外，又调来了五个日本人(金滕当会计)，日本人佐白掌管三道沟、岭木管二道沟、佐滕管头道沟、金田管哑叭沟。形成了一套管理和克扣工人的组织。大森管辖日本人、朝鲜人，日本人管工头，工头管工人。工人伙房供应高粮米，没有熟菜，粮食指标不够用，工人抢饭吃，动手慢的饿肚皮。同时每个工人都有定额。人工开采，劳动强度大，工资收入低，被工头克扣一部份，所以绝大多数工人辞退不干了，矿山出现了停工的局面。日本人没办法，无奈设立了劳工系，劳工系总头头叫王伯仁，手下有五个人，按各村、甲要劳工，先要五期劳工。从一九四二年以后，大部份转用“勤劳奉公队”当劳工(国兵漏子)。生活极为困难，加之劳累，劳工经常逃跑，所以劳工系整天到各村督促劳工。

一九四三年大森调走，由田中接替(俗称豆包)田中手段恶劣，经常打骂劳工。田中亲自下去要劳工，所以劳工又逐年增多。一九四三年达二百八十多人，一九四四年上升到四百余人，一九四五年八一五前又达到五百余人。据当时工头估算，日本人在大西沟掠夺的萤石约有一万吨左右。都是用称为“满铁”“汽车”运走的。

满洲国在喀喇沁旗旺业甸实行集家并村的罪行

赵振德

一九三三年，日本侵略者继军事占领奉天、吉林、黑龙江之后，又占领了热河。东北军和汤玉麟的军队，在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指导下，象秋风中的落叶纷纷退往关内，把东北三省和热河大片土地，拱手让给日本侵略者。日本军国主义者，抬出清朝下台皇帝溥仪作傀儡，建立了伪满洲国作为侵略工具。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积极组织和领导东北人民建立游击队和东北抗日联军，在敌人后方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救国运动。到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党加强了敌后抗日运动的领导，向东北和热河等地派遣了大批优秀干部，利用各种有利条件，组织抗日武装，开辟抗日根据地，和敌人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

喀喇沁旗地处热河省的腹地地带，山峦重叠，林木葱茂，是开展游击战争的绝好地方。这里的人民又是受封建势力、帝国主义压迫最深的，有着高昂的爱国热情，所以到一九四一年以后，大店、骆驼山子北沟、东局子西南沟里、王爷府的百石台沟里、四十家子的褶子沟、公爷府的樱桃沟里以及连通宁城的黑里河、十八盘道、小梁子等地方，就有八路军游击队经常出没。他们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建立抗日联络点，发展抗日救国武装力量。高桥

（苏然）烈士、杨雨民同志，就是当时活跃在我旗的抗日领导人。

日本侵略者，深感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如火如荼，大有燎原之势。为了切断八路军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达到他们彻底毁灭共产党的罪恶目的，除了豢养大批汉奸、特务，到处设立警察分驻所、特务、宪兵队搜捕抗日人民定以嫌疑犯、国事犯、思想犯种种罪名之外，于一九四二年索性在旺业甸村实行集家并村、设立人圈、划分无人区的野蛮恐怖统治。

日本侵略者，为什么要在旺业甸地区实行集家并村呢？这完全是为了对付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当时旺业甸是喀喇沁右旗西南边沿的一个村，它管辖着现在旺业甸镇和美林乡这一带地方。在它西南部有茅荆坝是锡伯河和茅沟河的分水岭，也是旺业甸村和当时七家村的分界线，西部是韭菜楼，和围场县相邻。东南有新开坝，和现在的宁城县黑里河，小梁子等地毗邻。这一带是重峦叠嶂、沟壑纵横、林深草茂，野兽成群的山岳地带。地理条件好，便于开展游击战争。一九四一年以后，便有一些革命干部来此开辟根据地。旺业甸村金家店的刘彬，南乌梁苏头道沟的郝瑞廷，就是抗日时期参加八路军的。由于自然条件好，日寇想进行清剿是非常困难的，何况又有当地广大人民的支持，无疑象猛虎添翼，敌人感到十分被动。尽管他们到处派驻军队，设立警所，派遣宪兵、特务，但敌人在明处，抗日武装力量在暗处，有利便打，不利就走，他们总也摆脱不了被动挨打的局面。再从整个战争形势来看，热河是伪满西南边境，紧靠冀东抗日前沿，日寇为了打通支援太平洋战争的运输线，为了巩固后方，把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

伪军和日本关东军的一支劲旅“八一八”部队以及许多警察讨伐队都驻扎在热河。特别对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更是防范森严。旺业甸地区的集家並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

一九四一年冬天，日本侵略者通过喀喇沁右旗公署作出了集家並村的决定並召开了有关会议。当时会上决定警备道路以南集家並村，以北不集家並村（警备路指从赤峰到承德的公路）。喀喇沁右旗实行集家並村的有七家（现属隆化县）、五家（现属承德县、当时属喀喇沁右旗）、旺业甸三个村。会后，以旗长乌勒巴图签名的伪旗公署的布告上也是这样说的。后来不知怎的又变了，以上三个村全面实行集家並村，不再分警备道路南路北。这和以前会上定的、布告讲的都大相径庭。恐怕老百姓说旗公署朝令夕改、言而无信，为了达到既保护旗公署的面子又实现全面集家的目的，不知是哪位高参的主意，暗地授意给警备路北旺业甸村古山甲长郑玉，按丹沟甲长高景荣二人，叫他俩在会上代表“民意”要求警备路北也实行集家并村。理由是集家的目的是为了防范八路军，如果只集警备路以南，就会把八路军赶到警备路以北去，为了全面防共，应该全面实行集家並村。

这两个人按着旗公署的旨意，果然在会上鸚鵡学舌般地讲了。那些政令的制定者，就坎骑驴，说是“尊重民意”于是开始了全面集家並村。

凡是集家並村的地方，旗公署都派了“集家工作班”负责执行这项工作。来旺业甸村的工作班共六个人。其中刘巨田是班长（刘是日本翻译，弘报股股长）其他成员有海老根喜一（日本人）、完山（日本人，教育科副）、小

山（日本人、警察）陈旭正、张凌云（蒙名额尔敦图，日本翻译）。

在勘定居民点时，刘巨田根据地方要求和物质贿赂同意定为六十四个。定点工作刚开始，大店甲的头道沟、新店甲的小美林沟，东局子甲的西南沟、五家甲的屯土沟来了八路军，有人向工作班报告了，海老根喜一和完山这两个人坚决不同意定六十四个点了。他们认为居民点定得多，山沟里的人家迁不出来，八路军照样活动。他们主张减少居民点，把山沟里的居民必须全部并到大川来。刘巨田觉得自己是工作班长，说话要算数，六十四个居民点不能再少，结果双方僵局了。海老根喜一和完山见刘巨田寸步不让，他们就直接回到旗公署向警务科打了报告。得到警方的支持，两天后就把刘巨田调走，由海老根喜一任班长，把原定的六十四个点改为四十二个。其中有：大店北沟、大店、三道沟门、罗圈铺、小美林沟、新店、前水泉、后水泉、旺业甸、洼子、金家店、湾子、东局子、奈林沟门、三兴庄、头把伙、三节地、福合元、正沟、吉祥庄、东祥庄、西祥庄、五家、屯土沟门、岗子、二把伙、两家、樱桃沟、美林河南大营子、河北大营子、椴木沟门、西湾子、西局子、羊草沟门、龙头庄、太平庄、黑狐狸洼、小美林、古山、长林子、中官、按丹沟。

一九四二年春，正当春耕季节，集家并村也开始了。按海老根喜一和完山的意见不让百姓种地，先抢修人圈。当时旺业甸村村长朱文选要求准许百姓先把地种上。这一要求多次遭到拒绝。有一次在旺业甸召开集家工作班长和村长的联席会议，旗公署的参事官（日本人）和警务科长（日本人）都参加了。朱文选又提出这一要求，这下

惹恼了日本人，认为他是有意阻挠集家並村，说他思想不好。他们正在议论时，幸亏被七家村工作班长吴洪龄听见。朱和吴的哥哥是同学，吴替朱作了解释，他说朱的请求是责任心的表现，百姓种不上地，到秋天大烟干和出荷粮向谁要？没有大烟和粮食用什么去支援圣战？吴洪龄是日本帝国大学留学生，是旗公署教育科长，所以日本人很看重他，这样才使朱文选得以解脱並允许百姓种十天地。

集家开始，先把居民点以外的人家限期迁走，不按时搬的，便认为是通“匪”。有的叫赶迁队用大绳把房子拉倒（先把墙推倒，然后用大绳拴到柱子上一拉，房盖全塌下来。）有的放火烧掉。把男女老幼都赶出去修筑围墙、挖掘壕堑，昼夜赶修，限期完工。（据说在七家、五家等村都出现过白天修的围墙，夜间就被八路军和人民群众推倒，所以日本侵略者要昼夜赶修。）

每个居民点，就是一个人圈，当时也叫部落。每个部落都派有警察或村吏员监督施工。这些人对百姓非打即骂，凶鹰桀犬，为虎作伥。人民百姓久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身无遮体之衣，腹无填饥之食，时有棍棒加身，生活无异于牛马。

尤其不堪忍受的是每个人圈多则二三百户，少则百十户，搬迁户旧房被拆毁，新房不许盖（多数人家也盖不起），人们白天在打骂交加中当劳工，晚上在墙脚屋檐下做乞丐，一家老幼冒寒暑，泣风雨，风餐露宿，贫病交逼，痛苦之情，莫可言状。

集家开始后，工作班派完山和小山两个日本人到各部落视察。有一次他们到东局子，头道沟在山上锄地的人为了反抗他们，人们就在山上放鞭炮吓唬他们。不料想，这下

招来了大麻烦。这两个日本人以为八路军放枪，跑回旗公署汇报了。接着旗公署就要求热河省派兵讨伐。不久，就派来警察讨伐队孙德部队数百人，还有便衣特务许多人，驻进金家店。在这支部队中，还有个叫黑烟的日本人是特务头子，他们每天都四处搜捕抗日人民。

一九四二年农历五月，才把围墙修完。人圈大小，各不相同，但格局几乎一样。墙高约五米，厚一米半左右，上有垛口，内有跑墙，四角有炮楼，墙外四周挖有深二米宽二米左右的堑壕。不论人圈大小，只设前后两个门，门用厚木板做成。每到晚上大门紧闭，直到天明才开门放人。每夜二门都有人轮流站岗，如有情况，即鸣放信号，全部落人立即四面登城守卫。人圈中央还有瞭望哨。岗哨高约七、八米，用园木构架，中间有爬梯，顶端是岗楼，站在楼上，能望到很远的地方，既能报火警，又能监视八路军。

部落设部落长一人，一般都是由当地有财势的人来担当；部落警一人，负责全部落的治安保卫工作。小枪队十余人，发给枪支和子弹，是部落的基本武装力量。其他凡年满四十岁以下的男人，都是挺身队队员。

日本侵略者为了检验部落的防御能力，有时也派人假扮八路军来攻打部落。这时，全部落人必须尽全力守卫，如果被攻破，就会被视为防共、反共不坚决，全部落人就会遭殃。

侵略者的意志总是和事实相违背的。他们的野蛮统治，激发了革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提高了中国人民的阶级觉悟，敌人的三光政策，更加密切了人民群众和共产党的骨肉关系。尽管侵略者使尽了各种伎俩，但也未能扑灭杀

敌报国的革命火焰。一九四二年以后，八路军乔装打扮成卖丝线的、卖木梳篦子的、打行炉的、做短工卖苦力的，纷纷来到旺业甸一带从事秘密的抗日活动。

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侵略者的血腥屠杀并没有挽救他的失败命运，而中国人民却在苦难中迎来了胜利，迎来了社会主义的新生。

满洲国蒙古王公土地奉上

木 斯

一九三九年（伪满康德三年）七月间，日本侵略者搞过一次“土地奉上”活动。通过这次活动，把封建的蒙古王公在清朝给予的封疆土地权，用一个冠冕堂皇的字样——土地奉上——，迫使蒙古王公“自愿”把地权交出来。实质是削掉蒙古王公占有土地的特权。日本帝国主义者，手中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攻城占地烧杀抢掠本来是他们的拿手戏，又何必对几个蒙古王公的后裔，还演了这样一出文明戏呢？我想其目的不外乎以下二点：一、蒙古王公的爵位和特权是清朝统治者为了拢络蒙古上层实行和亲政策的产物，虽然辛亥革命已使清政权早已倒台，但关外蒙古贵族封建主土地占有和奴隶占有特权因为地处边陲，文化落后而尚未受到根本的打击。蒙古族的平民阶层对王公的依附无论从政治上、心理上都有着历史渊源，不消除这种影响，对蒙古地区的统治就很难巩固。削掉土地特权，正是从根本上来动摇蒙古王公的政治势力。但是既然满洲皇帝形式上是清朝末帝溥仪的复辟。对清朝加封的蒙古王公，就不能不承认，为了在政治上给蒙古上层人士留个面子，所以才演了这出土地奉上的滑稽戏。二、把蒙古王公的土地特权，都集中到所谓皇帝手里，除了便于征用部署军事设施和充实侵略者的财政（可统一按土地征税）外，还有收买蒙古平民的用意，如土地奉上以后，以“蒙民裕生会”的

名义，给蒙民修建学校（如崇正国高、毓正国高）设立公医。平民不再向王公交租了，随着土地依附关系的改变，人身的依附关系也变了，平民不再是王公的奴隶了。

笔者的先人，是“世袭罔替”的“镇国公”，是第三代喀喇沁王噶勒藏（娶康熙第五女儿和硕端静公主为妻，康熙四十三年袭喀喇沁扎萨克多罗杜楞郡王）的后裔，这样，我也就成了清朝王公的贵胄，所以在这次土地奉上活动中，也有资格跻身于王公之列，去晋见康德皇帝。现将当时的情景，按自己的记忆，叙述如下：

一九三九年我在奉天省（现辽宁省）奉天市（现沈阳市）大北边门外日满书院念书（当时我的蒙古名字叫乌勒吉巴图、汉名乌益寿）。这年七月正在家度暑假，突然接到了喀喇沁右旗公署的通知，叫我随同代理旗长杨运芳（蒙名乌勒巴图）去新京（现长春市）开会。当时，我不知道是什么会，杨旗长也没有告诉我。通知的内容，是让各蒙旗的王爷、公爷去新京开会。王爷按清朝的世袭制度就是当然的旗长（当时，我们的王爷笃多博尚在日本留学，所以，由代理旗长去）可是公爷已是不任公职，几乎就是老百姓，还开什么会呢？。

一九三九年七月十六日我们到赤峰同翁牛特旗的代理旗长杨××，小公爷（把名字忘了）一同乘火车到达了满洲国首都新京火车站，住宿在新京市越香春大饭店。其他各地的蒙旗王公也都陆续来到了，休息了四天。

七月十八日上午九时，有专车送我们去国务院兴安总局，参加为我们举行的欢迎会（我们所乘的小汽车，是兴安总局给我们安排的，每旗一辆，共九辆，每天接送一直到会议结束止）。当我们的车队到达兴安总局门前时，迎

接的人有：国务院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日本人）兴安总局总裁扎噶尔、参事官博彦满都和吴椿龄等人。我们这次来自各蒙旗的王公共十八人（其中：代理旗长二人、十七岁的公爷一人、十四岁的公爷一人）。据我知道的旗有：喀喇沁左、中、右三旗、翁牛特旗、敖汉旗以及巴林、土默特等旗。兴安总局安排的欢迎会，没有什么仪式，实质就是个预备会议，就其内容来看就是一个“训导会”，在会议室内我们都排坐在一字形的三条沙发上。国务院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以“太上皇”的姿态，端坐在正中，兴安总局总裁扎噶尔陪坐在他的一边。首先由参事官吴椿龄（他是我旗汤土沟村人）挂着一副莞而不恭的笑脸对我们说：

“你们这次来京开会，游览一下新京的市容开开眼界；特别使你们意想不到的，还要进皇宫谒见皇帝陛下，这对你们来说是“无尚的荣誉”……。扎噶尔接着说：“希望你们要有礼貌，别叫人家嘲笑你们是土里土气的老蒙古”。说到这里，武部六藏哈哈大笑。经过他们的一番“训示”这个“见面礼”就算结束了，会后设宴招待了我们。

七月十九日我们每个人都穿好了预先赶制的“协和服”，戴上“协和帽”、胸前佩戴上黄丝“协和带”，手上戴的白手套。这身装束，对我这个十七岁的中学生来说，犹如一步登天，但又感到真有点喘不出气来。

我们穿戴好后，便从饭店乘车向宫内驰去。我们这些王公的代表团长是土默特旗的王爷旗长齐×××（据说这个王爷在日本留过学，四十来岁，高个子，一脸麻子）。伪满的“帝宫”是古老的建筑，据说这所房子从前是“道尹衙门”，在新京市算不上是最漂亮、宽敞的地方。宫门用水泥垒起的六个门垛，中间两垛高、侧面的低。正门是用

铁条焊接的大栅栏门，两边站着四个卫兵。“皇宫”是用青砖、瓦砌成的二层楼房。

我们的车队来到“帝宫”外，全体下车。首先由宫内府大臣熙洽和祭祀府官员引导，到“帝宫”旁边，用白木头构筑的“建国神社”进行参拜。全体行九十度的鞠躬礼。而后到宫内府一座大厅里，受到了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的接见。陪同他的有国务院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宫内府大臣熙洽，治安部大臣于芷山，兴安总局总裁扎噶尔，兴安总局参事官博彦满都，参事官吴椿龄等人。接见大厅的桌子上摆满了各种水果以及名茶、香烟。这些高级官员同我们座谈时，有掌礼处的官员向我们说明了谒见皇帝的各种礼节：①参见皇帝的地点在帝宫二楼。宫内御座前的地板上划有白线，每道白线上划有圆圈，圈内写有号码，参加的人按爵位大小站在指定的号码上，脱帽，不准仰视；②皇帝入座后全体三鞠躬（九十度）；③由满洲国帝室“御用挂”（“御用挂”是日本名称，意思是皇室秘书，这位“御用挂”是日本人，叫吉岡安直，据说他还是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陆军中将）。宣读“东三省蒙旗王公土地奉上书”④皇帝听完后如有训示，应保持肃静，洗耳恭听；如无训示，待皇帝回宫时，全体同声高呼：“祝皇帝陛下万寿无疆”。全体向后转走出殿堂。

掌礼处官员说完礼节后，大家在讨论中出现了问题。按参见皇帝的计划规定中，参加的人数是十五人（据说已奏皇帝了），但按皇室规定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没有资格参见，非正式人员也不准许参见（如代理、代办、代管人员）。在我们这些参见的王、公人员中有二人是代理旗长、还有二人年令不够，十八个人除去四人还有十四人，按规定

的参见人数缺一人，怕皇帝怪罪下来，后由总务厅长官决定叫十七岁的我，补到参加人数之内，这真是我的造化不浅。

正午十二时，我们十五人在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率领下进入宫室。这个宫室很窄小，木质地板上划有白线，距白线约三米远处放着皇帝的“御座”，是一个特制的高背大椅，紫灯心绒的椅面，四周用黄铜钉钉着，椅背的顶上刻有徽号——兰花（称之为御纹章），在“御座”的后面是一幅用绫纱制成的四扇屏风。各王公们按规定站在指定的园圈内，陪同的官员肃立两旁。顷刻间，就听到屏风后面金钟数响，接着又听到皮靴踏地板的声音。少顷，由屏风左右走出四员将官，（侍从武官）他们身着将校呢黄色军服，胸前佩戴着各种勋章，有的左肩上吊挂着二级大绶章（这种带子是用金丝线绳制成的，姆指头粗，绳的一头扣在左肩上，另一头别在军服右上口袋外，头上用红铜制成的类似笔杆形状的穗子，这种带子据说按级别大小还有区别，有长、有短）。随后皇帝走出来，身着黑色西式大礼服，没戴帽子，坐在“御座”上。这时由皇室“御用挂”用日语高喊敬礼；全体当即三鞠躬。此时皇帝在座位上稍稍点头致意。接着“御用挂”宣读“土地奉上”书（有中文翻译再读一遍）。由于我的文化浅，听不懂，对其全部内容记不起来，大概的意思是：各蒙旗王公在本境内，广占田地，地权在握，启用“红契”（就是对契，也叫牌子、合同），独征租赋，既有碍于国家征用，又不利于国民经营。今各蒙古王公深明大义，愿效祖宗之遗德，保先人之殊荣，奉上地权，诚意为国，以期大局和平，人类福祉。

“御用挂”宣读完“土地奉上”书以后，皇帝微微点头致意，随即站起，这时全体高呼“祝皇帝陛下万寿无疆”！此时，皇帝即转身回入后宫，四位侍从武官护随身后。参见的人向后转走出宫庭。

谒见皇帝的仪式，就是这样简单。在这次谒见过程中始终没有听到什么钟鸣鼎沸的声音，只是有几位新闻记者拍了片子。

参拜皇帝后，全体来到宫门外，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以及各部长官同我们合影留念。完了，来到休息室稍事休息。下午四时正由总理大臣陪同步入宴会厅赴“御宴”，宴会的形式和情景大致如下：

宴会厅的入门处，有一张玻璃面的桌子，玻璃下边放着厅内宴会桌位的编号。每桌八人，每个桌面上记有参加宴会的人名，赴宴的人首先看好自己的桌位，再就座。桌面上的名签很精致，黄色的纸片，中间写着赴宴人的名字，名字两边是金色的两条“龙”张牙舞爪，竖立在一根细钢条上。桌面上铺着漂白布，上面布满了鲜花。就餐者每人一块白方布、掖进上衣第二个扣子上。这时有招待员在每人面前放下一罗盘、碟，约有十多个，旁边放上刀、叉等食具，这些食具都是宫内特制品，每件食具上都印有徽号——兰花（全厅约有七、八个桌位）。

国宴开始，首先有一名招待员高声朗诵似的把这次国宴的程序、食谱、菜单、上菜的次序介绍了一遍，这时每桌前走来一名招待员，每上一道菜，这个招待员就用日中两种语言介绍这盘菜的名称、味道、营养价值等等。他一直到全部菜肴上齐后才走了。满桌佳肴的花样、数量和各种名酒我也记不清了，只是感到在我口中的滋味除了甜

就是酸。

宴会进行不久，主持人宫内府大臣熙洽致词说明这是皇帝陛下对王公们的恩遇。之后，由王公代表土默特旗王爷旗长（齐××××）致了答词。全体起立举杯，祝皇帝陛下万寿无疆！。

西餐结束，中餐开始。据说这次中餐所用的菜肴是满洲国各省、地区的名贵特产。花样齐全，各种名牌酒有几十种之多。宴会进入欢乐的高潮，开怀畅饮，互相敬酒（据我记忆，足有三、四十个盘菜）。席间，国务院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把那个十四岁的小公爷抱到怀里亲吻了一番。他还唱了一支歌。餐桌上的这些山珍海味、鸡、鸭、鱼肉，我也看不出什么是名贵特产。总而言之，这是“御赐”的。

在快要结束时，出现了一个小小的笑话，引起了就席人们的哄堂大笑，也给这些参加。“御宴”的老蒙古脸上抹了一点灰。在中菜最后一道菜，上来了一大盘四肢俱全的“元肉”汤，据说这种元肉汤有消食化气的功能，因此把它放在最后。当“元肉”汤刚刚放在桌上，有一位公爷突然站起，以惊奇的口吻粗声笨气地用半蒙半汉的口语嚷了一声“嚯！王八——唔！”这一声喊叫给人们的感觉是——老蒙古没见过大世面，也正应了吴椿龄的训导（后来知道了这个喊叫的人是牧区来的一位老公爷，不会汉语，事后在住地被吴椿龄好批评）。

七月二十日各蒙旗王公应邀出席了治安部大臣于芷山举行的招待会。这个招待会是在治安部举行的，规模不大。参加招待会的人，除了各蒙旗的王公外，陪同的都是日系官吏各部的次长。由于我们全体应约去体育场观看市

中学生运动会，所以时间不大，就结束了。

我们从治安部乘车去市体育场时，是由国务院次长（名字不详），陪同去的。街道上有时看见欢迎我们的学生，列队道边，手举日满两国国旗，还吹打着鼓号。进入运动场时，也受到了学生们的列队欢迎。对我们是按集体参观的形式安排的，没有什么仪式。下午我们游览了“大同公园”。

七月二十一日早，我们从住地出发乘车到兴安总局。开了一个简单的座谈会。谈谈自己的感想和体会。最后由参事官吴椿龄分发给我们每人一份国务院颁发的“文诰”。这个“文诰”实际是皇帝的“谕旨”正面是淡黄色、金边，文字两侧凸出两条金龙，正中印有满洲国徽号——兰花。背面是用黄绫裱的，正面印有团龙。正面文字是蒙、汉文对照，内容，因年久我记不清了，大意：“授予×××为×××旗亲王、郡王、镇国公、辅国公等”。

给我的这个“文诰”中写的是“辅国公”。在这个爵位上我很纳闷。过去听我母亲说过，我父亲是世袭“镇国公”，同时我在父亲的遗物中也发现过一枚“名片”，上面印有：“总统府一等护卫，镇国公、扎木逊朗扎布”。所谓“世袭”意思就是世世代代都要继承这个爵位，为什么这次给改为“辅国公”了？对此只是疑惑，当时也没有地方问明缘由。

发给我们“文诰”时，没有举行任何形式的仪式。我们心里也很奇怪。接着又分发给每人四张照片：①在皇宫同国务总理大臣以及各部长官的合影；②在皇宫内谒见皇帝时的一角；③赴御赐国宴时的情景；④乘车进入皇宫时的照片。

由兴安总局总裁扎噶尔公布了每年按季度给予各王、公的特殊俸禄（笃多博每季为四百六十元，我每季为三百四十元），同时每人又发给了旅费一百五十元。

这次蒙旗王、公“土地奉上”，对我这个十七岁的孩子没有什么体会。给我的印象是，观观、看看、吃吃、喝喝。关于它的政治意义和背景根本不理解但有的人是明白的。如土默特旗的王爷旗长齐××××，在闲谈中就对我们说：“土地权奉上”，给国家了，自己权力没有了，租子也不许吃了，开了这几天会不是光荣的，这是“刘备摔孩子，收买人心。”

贡桑诺尔布

吴恩和 邢复礼

贡桑诺尔布，别号乐亭，又号夔龛，系成吉思汗勋臣乌梁海济拉玛的后裔，卓索图盟喀喇沁右旗世袭札萨克多罗都棱郡王，兼卓索图盟盟长。性极恬静，平易近人，通晓蒙、满、汉、藏等各种文字；喜吟咏，著有《竹友斋诗集》流传于世；好属文，工书法，並擅长绘事，求知欲很强。有人说，贡桑诺尔布(以下简称贡王)一生手不释卷，当非虚语。

贡王青年时代在地方上办了很多应兴应革的事情，政绩显著，开朔漠风气之先，也极为旗民所称道。袁世凯窃国后，听到贡王在旗内兴学练兵的举动，恐其“图谋不轨”，屡电召京，授以蒙藏事务局总裁之职，並赐邸于景山之阴（即北京太平街王府），从此长川住京，不亲旗政。袁世凯称帝时，又被位于“上卿”之列，晋爵亲王，名为倚重，实即监视。贡王在北洋军阀政府的政治舞台上，活跃了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他不但是蒙古王公中的翘楚，也不失为当时的一位风云人物。对于这一个历史人物的功过评价问题，自有治史家们专门去研究。笔者都出身于喀喇沁右旗，对于贡王的一些逸闻轶事，见闻所及，知道的还算不少，现在仅就他的生平事迹，综述于后。

一、家庭及所受教育

贡王的父亲叫旺都特那穆济勒，他除了喀喇沁郡王及卓索图盟长等本兼各职外，因娶清朝皇族礼亲王的妹妹为福晋，又弄到了“御前行走”的头衔，每年都要晋京值班，和清朝的王公权贵过从甚密，因此也熏染了些很恶劣的习气。酷嗜京剧，不惜巨资在王府的偏院内修筑了一座富丽堂皇的戏楼，额曰“燕贻堂”。并由北京延聘京戏教师、琴师数人，教授新选拔进来而又不谙汉语的梨园子弟。学艺还未臻熟练，就强迫他们粉墨登场，引吭高歌，这位王爷则正襟危坐地去欣赏，听出有走腔或吐字不清的地方，就要勃然震怒，把演员拉下台来，痛打一顿，以示薄惩。有一个叫六十六的演员，饰京剧“芦花荡”中的张飞，在道白唱名时把张飞的“飞”字念为“灰”字的音，因一字之错，竟被这位魔王抽了几十蟒鞭，又把他的眼珠刺破，揉进石灰，使这个假张飞双目失明。

这位王爷还有一个令人难以容忍的怪癖，就是在每逢吃饭的时候，一定要把一至二名的奴婢们打得头破血出，这才捋髯大笑，浮一大白。

他还笃信喇嘛教，每日清晨都要念一遍藏语经卷，在他生活中好象是必不可缺的一件大事。可是在念经时仍然用手里拿着的法器，痛击近侍的头部，念得快，打得更快，好象是击节一样，看到血流如注的时候，他才罢手。对于王府内上下数百名的差役，每天每人仅发给两木杓的小米饭。永远不让他们吃饱。甚至连大小便都有一定的时间限制。诸如此类的残暴行为和灭绝人性的清规戒律，不一而足。

贡王就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在一般人的想象中，他不会受到什么良好的熏陶，但他这位象野兽一样的父亲，却非常认真地注意儿子的教育问题。贡王六岁那一年，就由山东聘请一位姓丁的举人为启蒙教师，同时还让他从喀喇沁中旗蒙文学者伊成贤学习蒙、满两种文字。贡王的天资虽不鲁钝，但也并不是象一些人恭维的那样“聪明绝顶”。由于他父亲的性情暴戾，课读颇严，他是朝乾夕惕，孜孜不倦，在十四、五岁时已熟读四书、五经和一些古典诗文，能写八股文，会作试帖诗。他父亲又强迫他从一位在西藏住过多年的喇嘛攻读藏文经卷，从一位河北省的武术家练习拳击和骑射。因此他在学问、品德和体魄方面，都受到一定程度的锻炼和教养。

贡王在十六岁这一年，和清肃亲王的第三女善坤结婚（即善耆之妹）。婚后仍在他的外书房着重练习写字和绘画，并研究音韵和词赋格律，同时整理他父亲所写的《如许斋诗集》的原稿。

听说贡王的婚后生活并不十分美满。这位肃亲王的儿女，自认为郡主下嫁，骄纵非常，对贡王视如草芥，不只是毫无尊敬，有时还横加凌辱，一切行动都要秉承她的意旨。贡王内心虽然不满，但慑于阍威，敢怒不敢言。

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四月，贡王的父亲旺都特那穆济勒病死，翌年春贡王晋京，正式承袭了喀喇沁王的职爵，时年二十七岁。回旗后，首先把他父亲时代的秕政尽行革除，解散了京戏班，遣送了梨园子弟；取消了每人每天两杓小米饭的制度；更重要的是减免了人民负担的无限徭制，而改为定额制。长期在他父亲的统治下喘息呻吟的旗民，好象得到了一次长呼吸，旗民从此对这一位新

王爷有了较好的印象。

二、兴学练兵，偷渡扶桑

光绪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年），由于义和团起义运动的失败，贡王听到“帝后蒙尘”，联军侵入的消息以后，他知道满清王朝已不足恃，很想开辟另外一条道路，遂有了兴学练兵发奋图强的决心。

光绪二十七年（一九〇一年）春，贡王晋京，会见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袁世凯，通过袁的介绍，以优厚的待遇延聘了保定武备学堂毕业的周春芳为军事教官，同年载归后，就由旗内选拔了一部分青壮年，把原有的王府卫兵及府内的青年差役，一并整编为正式军队，服装整齐，枪械精良，在周某的新法操练下，取得了显著成绩。后来这一支军队在保卫蒙旗治安、剿灭地方土匪中，都起了相当的作用。

光绪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年）贡王在王府的西院（俗称西衙门）开办崇正学堂，招收旗民的青少年及适龄儿童入学，有宿舍，有饭厅，有小型图书室，设备相当完善，一切都是免费。对于离家远而不愿住宿的学生，在上下学时都用四套马车接送。

贡王自任校长，派管旗章京朝鲁（汪良辅）为监督，並聘江南名士陆君略（浙江钱塘人）、钱桐（字孟材，江苏无锡人，北伐后任北京古物陈列所所长，死于任）总教习，长安（汉名邢宜庭）为汉文教员，富斋宝（汉名包景文）为蒙文教员，並责成陆君略和博彦毕力格（汉名汪国钧，字翔斋）编写汉文四字句蒙旗地理教科书。

贡王在崇正学堂的开学典礼上讲过这样的话：“我身

为王爵，位极人臣，养尊处优，可以说没有什么不如意的事，可是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高兴，因为我亲眼看到我的旗民子弟入了学堂，受到教育，将来每一个人都会担起恢复成吉思汗伟业的责任。”他又当场挥毫撰了一付楹联，悬挂在学校正厅的明柱上，文为“崇武尚文，无非赖尔多士；正风移俗，是所望于群公”，内嵌“崇正”二字，颇工整，陆君略、钱桐都交口称赞，认为他既为王爷，又为校长，应该有这样的口气。

光绪二十九年秋季（一九〇三年），贡王又通过布利亚特蒙古族高木布耶夫的关系，由崇正学堂选拔成绩优秀的学生德克精额、恩和布林（汉名吴恩和）、特木格图（汉名汪睿昌，即北京蒙文书社经理）、诺仍丕勒（汪子瑞）等四名，送入北京东总布胡同东省铁路俄文学堂，专攻俄文俄语。

这一年的冬季，由日本驻清朝公使内田康哉的介绍，贡王和御前大臣喀尔喀亲王那彦图的长子祺承武、肃亲王善耆的长子宪章等数人，各带仆从，未得清政府的许可，由天津私搭日本邮船东渡。此行除了参观正在神户开幕中的博览会外，并与日本朝野名流接触频繁，特别是和陆军参谋本部次长福岛安正中将建立了很密切的关系。

贡王访日期间，会见了东京实践女学校校长下田歌子，畅谈了女子教育的重要性，引起他极大的重视。回国后立即着手创办毓正女子学堂的筹备工作，并改修“燕貽堂”为校址，迟至光绪三十年夏季，正式开校。入学新生约五十人，王府内的侍女居多一半，贡王的妹妹七格格也入了这个学校（后嫁小巴林王色旺那木济勒旺宝）。由贡王福晋善坤亲自主持校务，聘巴图敖其尔（汉名伊宪斋）

为蒙、汉文总教习，喀喇沁中旗宁姓女子为蒙文教员，又由北京聘请状元徐郟的第八女张夫人（从夫姓）为汉文教员。经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福岛中将的介绍，又聘日籍女性河原操子（后称一之宫夫人）为日语、算术、手工、图画、音乐、体育等各门课程的教员。

贡王为了培养下级军官，在同年的冬季，利用他三叔父（俗称官城三爷）在王府西大西沟门的旧邸，设立了守正武学堂，选拔旗官员子弟约三十人入学。经福岛中将之介，延聘了日本陆军大尉伊藤柳太郎、陆军中尉吉田四郎为正付教官，又聘能操日语的浙江钱塘人姚子慎为翻译官。学科用日本操典，由日本教官用日语教课，操练时也要用日语口令，是完全日本化的一个军事学校。

贡王又异想天开地由军队中遴选了乌尔固木吉、铁丹、纳木格其等三名优秀士兵，为了避免清政府的注意，让他们剪发改装，偷送到北京东交民巷日本驻屯军的军营内，和日本士兵一起，学习器械体操和军乐。

贡王访日回旗后，设立毓正、守正两校时，延聘日本教官，让学生也普遍地学习日语，用日语授课，完全采取了日本教育方式，通过这些，我们很清楚地看出贡王的思想、政治路线和前一阶段已经有了显著的改变，充分暴露出崇日、亲日的迹象。

原来守正、毓正这两个学校的日籍教员伊藤柳太郎、吉田四郎、河原操子等都是日本陆军当局在日俄战争的前夕，派到喀喇沁王府潜伏起来的男女军事间谍，他们在贡王的优待和纵容下，进行不少的罪恶活动。在同一时期，北京的日本驻屯军也派出以爆炸东满铁路嫩江大桥为目标的两名“别动队”，一姓冲，另外一个叫横川。他们由北

京坐骡驮轿出发，经过古北口、热河，越茅荆坝，一直到喀喇沁王府来找他们的同伙伊藤、吉田两个人，密谈了两日，贡王让他们下榻王府西福会寺（俗称西大庙），备极款待，临走时都给换了喇嘛服装，并派亲信辛占住沿途护送到大巴林旗。巴林王扎嘎尔改派经文泰（汉名赵化民）继续送往哈尔滨，途中被东满铁路的警备队所发觉立即逮捕，当场枪决。我们看到日本的某一杂志上曾刊登过这两个特务被枪决时的像片；日寇占领东北后，除在哈尔滨车站前立了一座高耸入云的“冲、横川两烈士纪念碑”外，在喀喇沁王府的后山上也同样地建立了一座，解放后被当地人民所拆除。但对于贡王掩护日本特务这一行径，永远还存在人们的脑子里。

贡王在这一个时期，还向国外选派了一批一批的留学生，选出崇正学堂学生徐文明、白瑞（曾充国民党监察委员多年）送入保定简易师范学堂，又把恩和布林、特木格图、巴达而胡、太平等四名派往天津，在北洋实习工厂学习织布、染色、制造肥皂、洋蜡、粉笔以及电渡、照像等技术。同时又由崇正学堂学生中选拔于启明、乌勒巴图（汉名杨运芳）入上海南洋中学堂学习。又派诺仍丕勒（汉名汪子瑞，曾充国民党中央党部干事）、阿拉塔（汉名吴子兴）、那孙乌勒吉、班达木吉（汉名霍岳南，曾充北洋军阀政府西北筹边使署参赞）、阿拉金布（汉名郭皋轩）入北京陆军贵胄学堂。由守正武学堂选出温哲浑（汉名杨鼎臣，后为本旗管旗章京）、陶克托胡（本旗贵族、二等塔布囊，汉名陶建华）等二名送入保定军官学堂学习军事。选送学生双柱（汉名吴尧臣，现为昭盟政协委员）、巴音宝、六十五、吉里嘎拉等四名入北京测绘学堂学习测量。

並由毓正女学堂中选出女生叶婉贞、吴秀贞入上海务本女学堂。

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冬季，乘日本女教师回国之便，选派毓正女学堂女生何惠珍、于保贞、金淑贞（后与蒙文书社经理汪睿昌结婚）等三人，与河原操子同船渡日，入东京实践女学堂肄业。

河原操子归国后，贡王又由日本继聘当时为帝国大学讲师的乌居龙藏夫妇分担崇正、毓正两校的男女主任教员。

光绪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年）冬天，通过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次长福岛安正中将的关系，派遣男生伊德钦、诺门必立格（汉名金永昌，曾任伪蒙疆政府交通部长）、恩和布林、特木格图、于恒山等五名先赴天津，由一日人名日高者率领，乘日本邮船“太信丸”至神户登陆，又乘火车到达东京后入振武学堂肄业（振武学堂即陆军士官学校的预备科）。贡王保送这五名学生留日时，並未得清政府的许可，已经入学的学生，如被清朝驻日留学生监督（当时的监督为汪大燮）发觉时，就有被遣送回国的危险。日本学校当局也注意到这一点，便把他们和安南留学生安排在一起，同起居，共饮食，並限制他们和中国留学生接触和谈话。

这几名留学生由振武学堂毕业后，本应按部就班地升入陆军士官学校，由于清政府有不许可蒙族学习军事的禁令，恐被发觉，因此，除恒山一人因故中途辍学外，其他四名分别考入东京农科大学、千叶县医科大学、东京慈惠医科大学等学校。

未得清政府的许可仅通过福岛中将的关系私派留学生

一事，也是证明贡王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直接勾搭。

三、办报刊、创邮电、开工厂、设商店

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冬季，贡王为了启发民智，宣扬新政，曾在崇正学堂内附设了个报馆，每隔一天石印一大张，名曰《婴报》，並责成崇正学堂的师生源源投稿，除刊登些国内外重要新闻外，有科学常识、各盟旗的动态以及针对时局的短评等，由送报员送到人烟稠密的村落，大量散发，不收报费。

贡王因感到旗民中的文盲太多，又开展了相当广泛的旗民识字运动。他的具体办法是，用英文字母创造出一种简易的蒙文字母和拼音方法，先在军队中试行，逐渐推广到旗民中的男女老少，贡王的六十高令的母亲，也参加了这一个识字运动，据说由于她的带头，不到数月，成绩斐然，有大多数人都具备了阅读报纸的能力。与此同时，贡王还拿出一批钱来，在北京购买了一批《图书集成》、《佩文韵府》等大部头珍贵书籍，在王府的西跨院开辟了一个略具规模的小型图书馆，专供各校师生和旗衙门内的行政人员阅读。

贡王又痛感本旗境内邮电不通，诸多不便，遂派人到离王府九十华里的围场县接洽，取得县方的同意后，大量采伐附近各山的松树，自围场县的克勒沟到喀喇沁王府，在长达九十华里的范围内，贡王亲自督工，架设电杆，使对国内各地的电报畅通，不复使人有边塞荒漠内外隔绝之叹。他又由旗内选出精壮蒙人三名，分为三班，徒步往返于北京、喀喇沁之间，递送邮件，並设邮政代办所及电报收理处等机构，派干员专司其事。

自邮电畅通以后，各校师生及旗民中的知识分子，大批订阅北京出版的报章书刊，使当地人民能大量地吸收到外界文化，文风蔚然，盛极一时。

贡王又在王府东的坯厂子村（蒙语称平套海）设了一所综合性的工厂，内分织布、染色、造绒毡、肥皂、洋蜡、染料等各部门，聘天津北洋工厂实习回来的学生为技术员，又请一名天津工人为织地毯的老师傅，招收了很多蒙古青年为学徒工。

他又向北京的俄国道胜银行借款三万两为资金，在王府西八家村（蒙语乃门爱拉）开设了一升百货商店，名为“三义洋行”，委王府包依达（官名）哈莎巴塔尔（汉名金玉斋）、陶克托胡、博彦毕力格为正付经理，并由天津聘来一位高姓商人为助手，除出售综合工厂的一些产品外，由京津各地大量批发来当地蒙汉民所必需的所谓“洋广杂货”，百货杂陈，五光十色，远至百里以外和邻近各县、旗的购物办货的人们，络绎不绝于途，当时之喀喇沁王府有“小北京”之称。对于丰富人民物质生活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

贡王又派人到浙江购买桑苗数万株，经上海海运到天津，由天津装火车运到北京后，载以骡车再运到王府，在福会寺庙前和王府花园内，择地数百亩，广植桑苗，绿树成荫后，喀喇沁王府一带的养蚕之风遂炽。

日本驻北京驻屯军赠送贡王三十年代日本步枪一百支，他把这批新枪全部发给军队和守正武学堂的学生，利用替换下来的旧枪，招募了旗内青年约二十余名编为警察队，并在王府内设立警察局，置警官若干名，经常巡逻旗内各要冲，借以维持地方治安，数十年来喀喇沁王府附近

各村落未受到一次盗匪的侵袭，和这些设施不能无关。

贡王对于改革旧制度方面，也不遗余力，例如改跪拜礼为鞠躬礼，並极力提倡新式结婚，在其学生举行婚礼时，一定在红纸上亲笔写“文明结婚”四字派人送去，表示庆贺，他很反对冠婚丧祭中的繁文缛节和铺张浪费。他曾授意给崇正学堂的师生，组成了一个专门研究地方行政和“参佐制度”的政治小组，定名为“崇德学社”。该社开会时，贡王有时也亲自参加，很坦率地倾吐他个人的见解。他非常憎恨地方上的参佐人员（参领与佐领）的墨守成规和贪污腐化，在崇正学堂内曾附设了一所政治训练班，培养从事地方行政的人材，想把老朽昏庸的参领、佐领逐渐地加以淘汰，用新的一代来接替。为了避免守旧分子的猜疑和情绪上的不安，政治训练班在表面冠以师范班名义。

兴学练兵、庶政维新这一系列的措施继续了两三年之后，由于开支太大，少数的旗内财政收入已不能负担，在既不能开源又不能节流的情况下，出现了严重的经费支绌的现象。为了筹措经费，贡王煞费了一番苦心，起初把府内所存的珍玩古董、名人书画、衣服什物等运往北京拍卖，但所得无几，尚不敷开支各学校教师一个月的工薪。他不得已遂在旗政会议上提出：拟将孟干沟及汤土沟的牧场荒地招募佃户开垦，以荒价收入弥补财政上的困难的提案。办理旗政的大员们，对于他的意见不予支持，当大家面面相觑不发一言的时候，有一青年堂官名阿拉麻斯鄂其尔（汉名赵鹤亭），力表赞同，並自报奋勇地愿意承办这一件事，贡王遂任命他为开垦员兼王府长史（即总管）。阿拉麻斯鄂其尔取得了贡王的宠信之后，立即推荐他的好朋

友苏达那睦（汉名苏子余，系贡王的同族）为旗度支局局长。阿拉麻斯鄂其尔办理开荒事还不到一年，就大大增加了旗财政的收入，解决了很多的困难，而他自己也修筑华屋，每天要请几十个喇嘛念经，杀猪宰羊，大吃大喝，俨然是一个暴发户。他这样侵蚀肥己的贪污行为，被守正武学堂的学生数人所揭发，贡王大怒，拟逮捕法办，没想到事前提走了消息，阿拉麻斯鄂其尔偕全家老小远遁，经东蒙各旗辗转到哈尔滨落籍，在俄国人主办的《远东日报》馆充当蒙文编辑，客死他乡。贡王没收了他的房产充作王府卫队的兵营，由此也引起苏达那睦的不满，竟擅自离开了度支局长的职务遂赴北京，向理藩部以“违反旧制、创办新政”的罪名把贡王控告。当时的理藩部尚书是肃亲王善耆（系贡王的妻兄），贡王写给他一封信请求他代为疏解，同时派管旗章京汪翔斋把正在承德逗留中的苏达那睦拘捕回旗，关押在旗衙门的班房里（即拘留所）几个月，再未深究，即取保开释，苏达那睦从此远走高飞，参加了外蒙古哲布尊丹巴活佛的政府，回国后袁世凯封他为辅国公，长川住京，和贡王也时常见面，捐弃前嫌，恢复了过去的情感。贡王在推行新政中所引起的一场风波也就告一段落。

四、辛亥革命时期的贡王

光绪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年）理藩部尚书肃亲王善耆奉旨视察边境，先到喀喇沁右旗王府，派贡王为钦差大臣的随员，借机和肃亲王巡阅了卓、昭、哲三盟的各蒙旗，在与各旗王公贵族的接触下，他了解到不少地方的实际情况。

光绪帝和西太后相继崩逝，溥仪入承大统以后，军諮府大臣贝勒载涛因有建立皇宫禁卫军的计划，命贡王协助招募旗兵，他由旗民中精选了壮丁三百名，送入新建的近卫军内编为马队第三营（简称马三营），因此邀功清室，即被钦命为“御前行走”，驻京当差，位于驻京蒙古王公的班列，喀喇沁旗务则由协理希里萨拉代理。

武昌起义，清帝逊位，外蒙古的哲布尊丹巴喇嘛称帝，贡王也有趁火打劫搞内蒙古独立的野心和意图。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正月贡王向北京的正金银行借到白银三万两，並和日本泰平公司订立了一份购买枪支弹药的合同，言明泰平公司在南满铁路线的铁岭车站交货，贡王必须派人点收。不久他与在北京逗留的巴林王扎嘎尔，乘曹琨兵变之乱，仓卒各回本旗，准备招兵买马，取得武器后即行起事。毫无疑问幕后操纵者就是日本帝国主义。

贡王回旗后，就召集旗内高级官员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宣布了他的关于内蒙独立的计划和主张。他说：“这几年来，开办学校，训练军队，振兴实业，这一切都是为了蒙古民族的独立做准备工作。现在清朝颠覆，民国肇造，内蒙独立，正是我们行动起来的好机会，如果再拖延下去，就要前功尽弃了，由日本泰平公司订购的枪枝弹药，即将运来，需要马上派人去取，希望你们深思熟虑……”。出席会议的人们，对于他的慷慨陈词，不但不感到兴趣，相反地认为他要造反，恐稍有风吹草动，就要招致杀身抄家之祸，他们考虑到个人的安危问题，全场默然，不发一言，会议没有得到任何结果，不欢而散。

会后还有人威胁着说：“谁要给王爷去办理武器的事，我们就暗中派人在茅荆坝上劫杀”。贡王听到这样的流

言蜚语以后，异常悲愤，他很清楚地认识到这些顽固守旧的旗员们，始终在阻挠着他的行动和计划。接收武器一事又是当前非办不可的事，他于是找了两名学生（其中一名是笔者吴恩和）在他府内的外书房里密谈了几个小时，晓以大义，激以热情，使他们欣然地接受了由日本人手中接收武器的秘密使命。他们马上起身，先到北京，改乘京奉车到达了约定地点的铁岭车站，投宿旅馆，等候了几天，毫无泰平公司运来枪支的消息，只好很懊丧地回到北京，並写信给贡王复命。

后来才知道泰平公司没有按照合同的内容把武器运到铁岭车站。他们把几十木箱的枪支弹药，外标“东蒙古开垦用新式农具”等字样，分载于十几辆大车上，还有十几名改穿中国服装的日本浪人坐在车上押送，行至郑家屯附近时，突被吴俊升的驻军查获，人被枪决，枪被没收，偷送武器的问题，就落得这样一个结果。

贡王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悲观；因武器的落空和旗员的反对，就轻易地放弃了倡导内蒙古独立的全部计划。这也是日本帝国主义利用贡王要在内蒙古制造骚乱分裂阴谋的失败。贡王的不幸也是日本人的不幸，相反却是蒙古人民的大幸，这一点我们应该大书特书在这里。

贡王在日本特务操纵下，想要搞的内蒙古独立既经失败，他不甘寂寞地又提出一个“热河境内实行自治”的倡议。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冬季，他在自己的王府内召集了一次热河境内各蒙旗王公、扎萨克和各县士绅的联席会议，讨论了实行自治的具体方案，全场一致推举他为筹备自治的总负责人。他正要进一步采取措施的时候，已为热河都统熊希龄所侦知，急电大总统袁世凯请示制止的办

法。诡计多端的袁世凯，就用一个调虎离山计，发表贡王为蒙藏事务局总裁，晋爵亲王，电促赴京就职。贡王此时被这样一个高官厚禄所打动，摒挡行装，欣然就道。从此贡王离开了地方，摆脱了旗政，服服帖帖地变为袁世凯的御用工具。

× × ×

据说贡王驻京当差的时候，交游极广，除了和一些满清的权贵们过从极密外，他还和严复（《原富》的译者）、梁启超、吴昌硕这些学者画家们，也有很深厚的交谊。他每年一定要由旗内运来大量奶制品分赠给这些人。他常年写字作画的湖笔，都是严复送给他的。他通过这些人的介绍，结交了一批宦途蹭蹬落拓江湖的江南名士；他在旗内推行新政和倡导内蒙古独立等一些主要措施和计划，多一半是他们运筹帷幄代为策划的。他们以耶律楚材仕于元、韩德让仕于辽自拟，很想协助贡王作出一番“复兴蒙古的伟业”，以伸壮志。十数年前，笔者曾在喀喇沁旗王府贡王书房的废纸堆中发现他们当年往来的信札，其中有上款写“乐亭贤王”、下署“知名谨叩”的由上海寄来的一封信，笔迹遒劲，文亦古老，信里有这样几句说：“支那已不足恃，文王以百里兴，吾王好自为之，必大有可观之处……”。最后还写着“如赐 ラガシ（日语，即信）请寄上海××路××号××转”等字样。从这封信的语气看，肯定他是贡王的一位幕宾，以日本话作隐语，也可能是一位日本留学生。

我们知道吴绶卿先生（吴录贞）是贡王最折服的一位好朋友，常年间有不断的书筒往还，贡王有些事都要和他

研究决定。当吴绶卿先生随肃亲王善耆阅边，到达喀喇沁王府以后，显出他们特别亲近，贡王在自己的卧室里款待，把酒夜话，吴绶卿先生曾酩酊大醉，临出门的时候，就倒卧在外边的台阶上。翌日贡王亲书“吴绶卿醉卧处”六字，召匠人刻在台阶的右侧，现在铭刻犹存（有照片），人物已杳，仅能供人凭吊，从而使人回忆到当年他们之间的友情纯笃。

有人说，贡王在民国初年曾参加过同盟会，和孙中山先生也有交往，孙中山先生到北京的太平街喀喇沁王府访问过他几次，我们看到国民党的中央党部刊印出来的初期同盟会会员名单中，也有贡桑诺尔布的名子，事实证明贡王曾是同盟会会员。但是他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这一阶段中，究竟有那些贡献，起过什么作用，他对于革命所持的态度如何，关于这一方面的材料，我们还没有掌握到一点，不敢妄加推断，只好待诸异日，再作进一步的探讨。

贡王任蒙藏事务局及蒙藏院总裁前后达十六年之久（一九一二年——一九二八年），在这一个漫长的岁月里，北洋军阀政权本质虽未改变，但在人事方面有频繁的变迁，袁世凯以后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段祺瑞等相继为大总统或执政，可是贡王的蒙藏院总裁一职，始终是安若磐石，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他跃居于蒙古王公中的第一把交椅，位高望重，领袖群伦，表面上好象很活跃了一个时期，但並沒有搞出什么名堂来。袁世凯时代的蒙藏事务局，统由袁世凯的亲信、以熟习蒙情自居的付总裁姚锡光包办一切，贡王虽负总裁之名，实际上也不过一个尸位素餐的“牌位”而已。姚锡光去职后，他大权独揽的时候，我们只看到他创办一所因经费不足时有断炊之虞的蒙藏

学校，很勉强地可以说是他的“政绩”，但不能掩饰他由于滥用私人卖官鬻爵的恶劣行为所引起的各蒙旗的普遍反感。如用“庸人碌碌，乏善堪陈”的这句旧话来形容，可能是恰如其分。

贡王晚年的生活更为凄惨，他蕴有的私蓄，都被那位神通广大的福晋装进了自己的腰包。道胜、正金两银行的债务象两座大山一样地压在他的头上，使他周转不灵，一筹莫展，只好纵情诗酒，借以排遣。他常和陈半丁、宝熙、罗振玉这些人打交道，有时也出入于“青云阁”（在北京廊房头条）与李思本等（文士曾任蒙藏院秘书）下棋饮酒，在兴之所至的时候，还要捧一捧鼓姬王凤友，在八大胡同里也看到他的踪迹。这种迷恋于歌扇舞袖的行径，和他当年为了建设地方驰骋在喀喇沁草原的奕奕风采两相对比时，颇使人有“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之感。

北伐后，为了生活问题，又当了一任蒙藏学校校长，因学生反对而辞职。从此忧郁成疾，于民国十九年（一九三〇年）秋患脑溢血死于京邸，时年五十九岁。

（转自一九七九年《内蒙古文史资料》第一辑）

（编者注：一、一九〇三年（光绪二十九年）贡王去日本参观的博览会是“万国劝业博览会”，根据日文《满蒙》杂志记载，这次博览会是在大阪开幕的。

二、和贡王频繁接触的日本参谋本部次长福岛安正据日文《满蒙》杂志记载是大将。

三、在贡王创办的“守正”武学堂担任教官的吉田四郎，有的材料写为“吉原四郎”，在本文中两者都用了，据当时崇正学堂其他人记忆，也是吉田四郎。）

喀喇沁部扎萨克历代晋封情况

郑瑞峰

固噜思齐布：元臣济拉玛第十五代孙。初为喀喇沁塔布囊。天聪九年授扎萨克。崇德元年，封固山贝子，赐多罗杜棱号。顺治七年，晋多罗杜棱贝勒，诏世袭罔替。十五年卒。

图巴色棱：固噜思齐布第长子。顺治十五年，袭扎萨克多罗杜棱贝勒。康熙三年卒。

第一代王：班达尔沙；固噜思齐布第三子。康熙三年，袭扎萨克多罗杜棱贝勒。七年，晋多罗杜棱郡王，十年卒。

第二代：扎什；固噜思齐布次子。康熙十一年，袭扎萨克多罗杜棱郡王。四十三年，卒。

第三代：噶勒藏；扎什次子。康熙四十三年，袭扎萨克多罗杜棱郡王。五十年，以罪削。

第四代：色棱；扎什第三子。康熙五十年，袭扎萨克多罗杜棱郡王。五十六年，卒。

第五代：伊达木扎布，色棱次子。康熙五十六年，袭扎萨克多罗杜棱郡王。乾隆四年卒。

第六代：喇特纳锡第；伊达木扎布长子。乾隆四年袭扎萨克多罗杜棱郡王。四十八年赐亲王品级。五十二年卒。

第七代：端珠布色布腾；喇特纳锡第长子。乾隆五十二年，二月袭扎萨克多罗杜棱郡王。八月卒。

第八代：满珠巴咱尔；端珠布色布腾长子。乾隆五十二年，袭扎萨克多罗杜棱郡王。五十三年，赐亲王品级。道光八年卒。

第九代：布尼雅巴拉；满珠巴咱尔子。道光八年，袭。十六年卒。

第十代：色伯克多尔济；布尼雅巴拉子。道光十六年袭。

第十一代：旺都特那木济勒；色伯克多尔济子。同治七年袭。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卒。

第十二代：贡桑诺尔布；旺都特那木济勒子。光绪二十四年袭。民国十九年卒。

贡桑诺尔布生二子；长子笃多博，次子笃多基，笃多博任过伪满喀喇沁右旗旗长及伪热河省参事官。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日本投降后，偕家逃亡。

喀喇沁部扎萨克王品级多罗杜棱郡王世袭表

郑瑞峰

苏布地



固噜思齐布



图巴色棱 → 班达尔沙 → 扎什



噶勒藏 → 色棱



伊达木扎布



喇特纳锡第



端珠布色布腾



满珠巴咱尔



布尼雅巴拉



色伯克多尔济



旺都特那木吉勒



贡桑额尔布

崇 正 学 堂

汪 宗 一

溯老哈河而上，经赤峰西至锡伯河中游地带，就可望见绿绿葱葱的北山麓下松柏参天、规模宏大的一所官邸，那就是卓盟喀喇沁王爷府。

这位王爷——贡桑诺尔布承袭了王爵以后，他见到列强侵入，国是日非，清室腐败已不足恃，遂有了兴办学校，启发民智，扩充武备，励精图治以资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的决心。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在物色师资、选定校址等方面，做好准备以后，乃于一九〇二年夏季就在王府西院（即西衙门）开办起来了一个学校。久处于愚昧无知的蒙民才得到了入学念书的机会。这所学校，贡王自任校长，当时除采用本地人邢宜庭为汉文教员，汪良辅为监督，富斋宝（汉名叫包景文）为蒙文教员外，又聘浙江钱塘人陆君略，江苏无锡人钱桐等人员负责教务。

校址宽阔，房屋齐整，前后共有四层院落，东西各有陪房。师生宿舍、饭厅、小图书室、客厅、帐房（总务办公室）应有尽有，设备亦颇完善。校门前是操场，校庭后有桑树园，环境十分优美。在开学初，旗民都以喜悦的心情，争先恐后地给自己的子弟报名。当时共招收青少年学生四、五十名，但其中多系附近的主公贵族的上层子弟。一切都是免费，经费由度支局（王爷府的财经机关）开支。

道远不愿住宿的学生还用马车接送。

课程以蒙、汉文为主，汉文多采用古书如《四书》、《五经》，初小四本小书《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名贤集》之类，兼学书法、绘画、音乐、体操等科目。

一九〇四年夏季，改修燕贻堂（原戏楼）为校址，建立了“毓正女学堂”，由福晋善坤（贡王的妻子）担任校长，聘用伊宪斋为蒙汉文教员，又聘请日本女子河原操子为日语教员。于同年冬季为培养低级军官，在王府大西沟门（三叔父官城老爷的旧邸）建立了“守正武学堂”，聘请日本军官伊藤柳太郎大尉、吉田四郎中尉为军事教官。又聘请能讲日语的浙江人姚子慎为翻译。一九〇五年冬季河原操子归国后，又由日本聘请来鸟居龙藏夫妇分担崇正、毓正两校的主任教员。后因日籍教员前后回国，由于师资缺乏以及经费支绌等原因，守正、毓正两校，也就相继停办。惟有崇正学堂独存下来，并在不断地巩固和飞速发展着。

从一九〇三年到一九一二年期间，为了吸收先进文化科学技术知识，曾向国内外选派了一批接一批的留学生。派往国内北京、天津、上海、南京、保定等各大专院校学习的有吴恩和、汪睿昌、巴达尔呼、太平、徐文明、白瑞、于启明、杨时芳、汪子瑞、吴子兴、那逊乌力吉、霍岳南、郭皋轩、李振卿、杨鼎臣、双柱、巴彦保、六十五、吉力嘎拉、叶婉贞（女）、吴秀珍（女）、白昆峰、铁丹、那木格其等约三十名。派往日本留学的有何惠贞（女）、于保贞（女）、金淑贞（女）、金勋卿、吴恩和、伊德钦、于恒山、特木格图等人。

在此期间，由汪翔斋、陆君略为主编，写出了蒙旗地理教科书，开办了一个小型图书室，专供师生阅读，并在崇正学堂内附设了报馆。又开展了较为广泛的扫盲运动，创造了简易蒙古文字和拼音方法，成绩显著。从此文风大振，爱学习、求上进，蔚然成风。一九〇六年清朝肃亲王善耆由北京来喀喇沁视察时，曾亲笔题书“崇正学堂”四个大字，字颇工整，将此刻制成长幅匾额，悬在学堂正门，用以表彰、留念。

从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二九年间，由于贡王离旗去京就职，不亲庶政，崇正学堂就由邢宜庭接任校长职务。从此人事变动很大，李振卿为监督，白昆峰为提调兼操练，汪麟阁总管财政。由于学生逐渐增多，已达到二百多名，分为四个班。教员亦从原有六、七名增加到十名，其中有张子栋、张伟卿、汪浚川、金永年、李香圃、韩耀奇、吴瑾玲（女）……。

随着社会的发展，新文化的传入，课程除高级班仍保留一部份古典文学，并开设了英语课以外，各年级均采用了旧民国教育部审编的国文、算术、修身、自然科学等书，并普遍增加了缀法（作文）书法、音体等课程。同时，为了给三、四名留学预备生特殊照顾，抽出张子栋教员利用东报馆为教室，专负补课责任。

在此期间，由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五四”青年学生运动的爆发，特别是北伐战争等消息徐徐传来之后，首先高年级学生初步接受了爱国主义的革命思想，自觉与不自觉地流露出反对侵略，抵制日货的言论，并开始组织了学生自治会，砸毁了“大成至圣先师孔夫子之位”的牌子，并正在准备同学校当局提出废除体罚、改变学校老爷

作风等等要求时，被校方察觉，不但不予支持，反而以蒙藏学校闹学潮造成大乱为戒鉴，通过软硬兼施的训导，把刚刚形成的革命波澜，在一阵冷风中，竟自消散，这是一九二七年的事。不料，在第二年校方就宣布了一项向学生征收膳费，每人十元银洋的命令。可是谁都知道崇正学堂拥有校田不下数千亩，按每年收入足可解决几百名学生的伙食费开支，並有盈余。只因用人不当，管理不善才给学校造成亏损，给学生增加了不应有的负担，这不能不归咎于总揽财政权的大汪老爷（汪麟阁）和校田总管二汪老爷（汪璉）、大号把头李庆文等人。他们勾通一气，侵公肥己，私相授受，贪污校粮，克扣学生，盖新房，放借贷，大发其财。

学校虽如此黑暗，学生的学习情绪並未削减，有些学生为了深造，克服了所有的困难，负笈千里去北京、天津、上海、南京各大城市求学者源源不断，如：汪春林、陈玉贤、陈国祯、汪文林、石含璋、金子强、金子铭、鲍振华、吴金铎、陈国范、薛永禄、吴鹏龄、吴熙宪、李继昌、乌臻和、希中和、吴璉玲（女）、于保衡、邢复礼、杨德新、汪继昌、吴凤亭等，据估计约有三、四十人之多。其中绝大多数是私费学习。

从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五年间，学校人事变动很大，吴椿龄、吴鹏龄、杨运芳、汪浚川等都先后当过校长。由于附近旗县的学生来此就学的络绎不绝，学生增加到近三百名，分为六个班，成为六年制完全小学。教室不够用，就在王府西跨院开辟了两个教室（老爷庙院），教员也增加到十数人，除外地教员章春生、严舒紫等人外，还有石含璋、邢子巖、汪文林、汪浚川、郭秀山老师等，

另外，从一九三三年又进驻了两名日本人（其中一名叫福永）。

在此期间，因蒙文教材不足，就在王府西跨院（原书苑）设立了蒙文印书馆，由汪浚川负责编写和印刷。同时为培养师资，招收约三十名学生为附设简易师范班一处。並制定了词义深远，唱起来悠扬雄壮的崇正学校的校歌。其汉文歌词如下：

“惟我学校，创自晚清，悠久历史，灿烂光荣，八方稚子，遇尔来同，如沾化雨，如作春风。师资造就，启迪万方，教育普及，文化发扬，阴山苍苍，锡水洋洋，崇正之名，山高水长。”

从一九一二年以后，出国学习的学生确实不多，盖因贡王去京高就以后，沉醉于官途，遂将桑梓教育大事，置于脑后了。旗里当权者，又只忙于公私杂务，再加上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当然也就无暇顾及这些事了。尽管如此，仍有一部份学生如杨德新、邢复礼、希中和、于保衡等人，坚持了去国外留学的志愿，通过各种关系和努力，终于达到了去日本学习的目的。

从崇正学堂创始起算，去国内外求学的学生（包括个人通过各种渠道和私费学习者在内）毫不夸张的计算，足有一、二百名之多。但此外还有历年从崇正学堂毕业后，因无力升学，就坚持自学，或在工作中刻苦钻研者，不可胜数。他们分散在祖国各地，在党的领导下，在各个不同的岗位上为社会主义祖国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从崇正学堂到崇正国高，人材辈出，源远流长。

曾记得，崇正学堂的门旁有一棵古老挺拔，根深叶茂的榆树，树上长满绿油油的“冬青”结出鲜艳的红果。一

年一度来自远方的“冬青鸟”欢聚在一齐，在树枝间自由飞舞、歌唱，这一美好动人情景，象征着崇正学堂历史悠久，世代长青！

特睦格图——蒙文铅印的开创者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蒙古史研究所 讷古单夫

我国近代蒙古族卓越的出版家——特睦格图的名字，在广袤的草原上早已遐迩闻名，他终生为本民族的文化教育出版事业奋斗的光辉业绩，令人感动崇敬，但遗憾的是对他开创的蒙文铅印史的功绩很少道及，也从未系统地进行全面研究加以介绍。出于崇敬的心情这里发表他的生平略传，以期得到蒙古学者的关注，给这位出版家以应有的地位。

在本文撰写过程中，承蒙额尔敦陶克陶、墨尔根巴图尔、吉儒木图、赛音卜合、色道尔吉、额尔登泰等老同志及特睦格图的亲朋的热情指导和帮助，并由内蒙古图书馆等单位的同志提供了宝贵资料，在此，谨向上述同志和单位，表示深切的谢意。

× × ×

蒙古族卓越的出版家特睦格图，汉名汪睿昌、字印侯〔1〕，留日时启用日本名古松，原内蒙古卓索图盟喀喇沁右旗王爷府大西沟（今内蒙古昭乌达盟喀喇沁旗）人，一八八七年旧历十二月七日生于一个平民的家庭〔2〕。由于他从小聪明伶俐才智过人，受到喀喇沁右旗亲王、蒙藏事务局（一九一四年改蒙藏院）首任总裁贡桑诺尔布（俗称贡王）的赏识〔3〕，收为义子，并举荐到贡王在本

旗创建的蒙古民族第一所“洋”学堂——“崇正学堂”学习〔4〕。一九〇三年，由于他学习成绩出众，遣赴北京**恩布胡同东省城俄文学校**，专攻俄文俄语。自**一九〇〇**年，帝国主义列强——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烧杀抢掠，他中途辍学回乡，他对此义愤填膺，不可名状，激起他对帝国主义的强烈憎恨，对祖国的无限热爱。

一九〇三年贡王自备资金，游历日本，考察政治，调查教育新法。归国后，于一九〇六年冬从本旗选送留日学生时，特睦格图入选，被派赴日本学军事，入东京振武学堂陆军士官科。毕业后，他立志学医，经贡王同意，又转入东京慈惠医科学学校学医。他在日本留学六年回国，成为蒙古族近代第一批留日学生之一（共八人，其中女生金淑贞，于一九一〇年同他结婚，她对特睦格图的事业，有莫大的帮助）。

他回国以后，从一九一二——一九一三年曾在内蒙古喀喇沁旗王府、赤峰行医年余，直到一九一四年，贡王在北京任蒙藏院总裁时，命他为荐任翻译官、首席翻译官兼庶务科科长、典礼司员兼蒙藏学校教授〔5〕，曾陪同贡王多次参加重要蒙藏会议和外事活动。当一九一九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时，他同情并积极支持北平蒙藏学校的学生运动。

特睦格图从不留恋高官厚禄，一心致力于蒙古民族的语言、文学、历史研究，并专心致志从事蒙、汉、藏、满文的古代典籍翻译与整理。他借职务之便，在北京结识了许多蒙古族和其他民族的社会名流和学者，同他们畅谈国事，共议救国救民的道路。此时，特睦格图已是深通蒙、汉、满、藏四种语言文字，以及通晓日、俄文的杰出蒙古

族学者了。

他在著书立说从事翻译工作时，深感出版蒙文书籍之难。当时蒙文印术，只有少量木刻印和石印，尚未出现铅印，对此他十分痛心。国内外许多有志者，尤其蒙古族的技术人材，虽曾多次努力创制蒙文铅字印刷，但都未获成功。如：清朝光绪、宣统年间有“蒙人扎拉丰阿君，纠合同志在北京设蒙藏编辑局，铸造蒙文铅字，翻印书籍。旋以事阻，未果，此有志未成也。”后来，于一九一三年汉人黄序东（通晓蒙文蒙语）“铸成蒙文铅字……适库伦都护使征求边才，黄君为罗致而去，印刷事业亦未果”〔6〕。国外一九一三年俄国人在哈埠出版过蒙文铅印杂志，一九一五年日本人在东北出版过蒙文铅印日报，但对中国技术保密，未得传入。而国外制成的蒙文铅字，字形难辨，工料毛糙，印刷体上下衔接不合缝，十分不精致，所以国外也是制而少用。富于强烈民族感的特睦格图决心昌盛本民族文化，不委外辱，开始着手研究创制中国的蒙文铅字。

特睦格图创制蒙文铅字的业迹，是从“漠南影新社”开始的〔7〕。他从日本回国以后，在北京私宅设立“漠南影新社”——家庭照相馆，专为旅京蒙、藏人服务。由于他摄影技术的高明，曾博得了中外好评，所以他意图以“漠南影新社”的名义，石印蒙、汉合璧教科书出售，借以筹资创制蒙文铅字的准备。

一九一五年前后，特睦格图对中外铅印工艺作了充分研究之后，他首先将蒙文、满文上、中、下三体四百余字（蒙文三百二十四，外加满文等特需字头）书写成整洁的正楷字，然后分类排队，选其美观大方的字形，以他的妙

手精雕细刻，反复实践，第一次用牛角刻出过八十五个字形，“用解剖之方，成聚珍之板，以一字之剖用，能作数字之运用”〔8〕。但应用于印刷时上下深浅不一，粗细不均，未获成功。

但他从不灰心，继续坚持攻关，他第二次改用日本黄杨木作材料，手刻数百蒙文字头。改进后的字型略有改进，但我国京津地区不能承制木刻活字板，如若用木刻字模，必须到日本，当时无任何经济外援的特睦格图怎么能到国外？因而试制蒙文铅字又告失败。

特睦格图贫穷如洗，创制蒙文铅字不得不暂停。到一九一九年，在贡王的支持下，他数奔天津向日本人学习有关雕刻技术，一切磋琢磨，初步制成了蒙文铅字，作了铜模，铸出了字。这是巨大的进步，他终究看到了自己为民族事业奋斗的希望。这时的蒙文铅字，在拼制时上下衔接仍有配合不当之处，他继续以顽强的毅力克服困难，工作不止，又经过反复试用、改进，终于在一九二二年冬，蒙文铅字印刷术在我国第一次获得成功〔9〕。特睦格图为我国蒙古民族赢得了荣誉，从此为我国蒙文印刷业奠定了基础并得到飞跃发展。

蒙文铅字创制成功后，特睦格图游说于热心于蒙古文化的蒙古族社会贤达，征集了少数资金（贡诺尔布、吴桑恩和、金永昌、张文、杨时芳、刘丕元等人入股，最多者不超过大洋一千元，最少者也在六、七百元，共计约股金五千元左右），于一九二二年，特睦格图等写出“蒙文铅字说明书”，呈请立案。一九二三年民国政府农商部发奖表彰，不征捐税，发给三十年专利证书〔10〕。与此同时，特睦格图创制的满文铅字亦同蒙文铅字双双问世，我国

满文铅印亦由此诞生了。

自特睦格图创制蒙文铅字近六十年来，在已经出版过的蒙文铅字印刷品中，形体类型各不相同的蒙文铅字约有十余种，各种各样的蒙文铅字中，蒙文书社特睦格图创制的铅字如蒙文译本《辽史》、《金史》等书内二、三号蒙文铅字印成品，可以和今天使用的蒙文铅字体媲美，所以一些老铸字工艺家们说：“蒙文书社的蒙文铅字连接处结构相称，衔接合缝，字身全部体格大小长短规格相称，形式不同的字头，稍微有点区别处，明显了然，制造精细，因而印成品清秀美观，阅读时不费目力”〔11〕。这在蒙古民族印刷史上是划时代的改革，从此蒙古民族的印刷业踏入了近代先进印刷业的行列，它对蒙古族文化教育的发展具有深广的影响。

一九二三年春，特睦格图在北京创办蒙古族有史以来第一家出版社——蒙文书社，自任总经理，当时云集在京的蒙古族学者伊德钦、金永昌、恩和布林等，决心启蒙蒙古民族，同时兴办了蒙文书社蒙文印刷厂（原在北京教楼大街张旺胡同九号，后迁北京北池子五十七号公产房院内），他们蒙文铅印的第一部书是《西汉演义》，一套八册，印数五百套，计四千本。从此，开创了蒙文铅印时代。所以我们可以自豪地说，特睦格图是我国近代蒙文铅字印刷的创始人。

特睦格图创制蒙文铅字以后，曾有不少西欧人前来蒙文书社学习，由于特睦格图慷慨相赠，使中国的蒙文铅字技术流传于西欧。

一九二四年，蒙古人民共和国也派人到蒙文书社学习，并且聘请蒙文书社技工汪振铎到蒙古开办蒙文印刷厂。

在我国，继特睦格图创制蒙文铅字以后，所开办的蒙文印刷厂，大都是在北京蒙文书社技术传播下兴办起来的，诸如内蒙古东部影响最大的东蒙书局（在今沈阳），曾于一九二三年由郭道甫派两名蒙古人前来蒙文书社学习后，于一九二四年创办的。一九二五年上海商务印书馆聘请蒙文书社技工师乡亭赴上海，在商务馆开始印刷蒙文书刊。内蒙古西部于一九二六年创办的察哈尔盟（商都）蒙文印刷厂，也是先在蒙文书社培养技术人材，然后回商都开办起来的。因而特睦格图及其蒙文书社在推广蒙文铅印先进技术上的贡献同样是不可磨灭的。尤其蒙文书社培养出来的第一代蒙古族印刷工人，他们不仅成为解放前蒙文印刷业的前驱，为我国蒙、满、藏文铅印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成为我国解放后蒙文印刷业的技术骨干和印刷各业的工艺家。以他们创造性的劳动，继续为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贡献力量〔12〕。

一九二五年，特睦格图受段祺瑞政府委托，他又继续创制了藏文铅字，在蒙文书社内铅印藏文典籍。第九世班禅到京后，特睦格图在北京瀛台兼班禅照料处处长，又兼班禅印经处处长〔13〕。

从一九二二年——一九二九年末，是蒙古书社印书较多的几年，仅特睦格图翻译、编辑而付诸印刷出版的书籍，如，《元朝历代帝后像》、《成吉思汗传》、《成吉思汗箴言》、《辽史纪事本末》、《金史纪事本末》、《元史》、《三国演义》、《西汉演义》、《聊斋志异》、《进士缘》、《公文呈式》、《蒙汉合璧四书》、《蒙文分类辞典》、《蒙汉分类辞型》、《蒙文教科书》、《内外蒙古地图》、《内外蒙古各盟旗系统一览表》、《蒙、日

语会话》（当时畅销于日本各地），还出版了蒙、藏文字典、藏经多种，並译完了《红楼梦》，只是因资金困难，未能刊印问世〔14〕。

一九三〇年二月，他任南京政府教育部蒙藏教育司常任编审兼科长，十二月专任科长，直到一九三四年十一月辞职。他是我国最浩瀚的教育年鉴——《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的编审委员之一，並由他撰写了有关蒙藏教育部分〔15〕。

一九三〇年秋，由于南京政府教育部、蒙藏委员会、蒙古各盟旗联合驻京办事处，都急需蒙藏文铅印，遂由吴鹤龄（蒙藏委员会蒙事处处长）给联络会商〔16〕，並由上述三机关出资六百元，把蒙文书社迁到南京（小沙帽巷二十二号）〔17〕。从此，蒙文书社停止印刷个人著作，专供上述三机关承印蒙、藏、汉文书报、公牍之类，但从资金收入来说，这一二年是蒙文书社的黄金时代，特睦格图等人获得了巨额资金，並新购置了不少近代先进印刷设备。

一九三二年一月，日本军舰炮轰南京，迫使蒙文书社关闭，只印刷教育部少量蒙文教材。

一九三四年五月，他被邀赴伪满洲国，在钱家店（今哲盟通辽市）、王爷庙（今乌兰浩特市）兴安军官学校任蒙文教授〔18〕。南京蒙文书社也就因此而结束了。

这一时期，他同那顺孟和一起把英文打字机改革成蒙文打字机，並应用于兴安军官学校〔19〕。

一九三六年，他欲在兴安军官学校印刷蒙文讲义，由北京、南京把蒙文铜模、排字架、铸字机、印刷机等运回王爷庙，但筹备近一年，因资金不足，未能如愿。后来，

恩和布林(他也是蒙文书社的入股者)到王爷庙同他接洽,将此印刷设备交给蒙文书社技术工人玛希巴雅尔运往伪蒙疆政府使用。一九三七年四月间运到呼和浩特,为《蒙疆日报》社开印《蒙古周报》。一九三九年九月,又将这套设备运到张家口《蒙疆新闻社》〔20〕,继续出《蒙古周报》。直到解放,特睦格图的成套印刷设备,成为今天内蒙古蒙文印刷设备的前身,继续为解放了的内蒙古人民服务。

一九三九年五月二日,蒙古民族杰出的出版家、翻译家、蒙文铅字发明家病故于王爷庙。

人们也不要忘记特睦格图也是十分关心自己民族的解放事业。在第三国际直接领导下成立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一九二五年十月十二日成立于张家口土尔沟街),它在内蒙古革命活动的许多宣传品,都是特睦格图给予印刷的。他本人虽未加入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但对内蒙古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给予极大的同情和支持〔21〕。

特睦格图终生奋斗于蒙古民族的出版事业,他创制蒙文铅字,他亲自翻译、编辑、著作、校勘、审阅过大量的汉、蒙、藏、满文历史、语言、文学典籍,所以也不愧为我国蒙古民族卓越的出版家、翻译家,同时也可以誉为我国藏族、满族的出版家、翻译家,他为我国汉、蒙、满、藏各族人民的传统友谊作出了巨大贡献。他翻译、编辑出版的蒙文、藏文、满文典籍,不仅发行国内各地,而且也畅销世界各国,尤其日、俄、法三国最多。他对中外各国人民的文化交流,对提高我国蒙古民族在国际上的声誉,产生过巨大作用。由他和伊德钦编著的八册《蒙文教科书》,作为我国第一部蒙文科学教材,不仅当时成为我国蒙

古民族青少年的教科书，而且发往海外，成为我国邻邦——日本人民学习蒙文蒙语的入门书籍。当时国内外评论他们说：“在蒙古早有圣人之目，此书成功，既为蒙文中之新发明，其裨益学术界者正无涯止也”〔22〕。可以看出他在国内外已声誉蜚然，闻名于世了。

由他主编、翻译、出版的蒙、汉、满、藏文书籍，多达几十种，数量也非常可观（约有五十几种，十万册以上），在蒙古民族的出版史上，至今享有盛名，留芳百世，成为我们的珍藏品。因此，特睦格图在蒙古民族出版事业上享有独特地位，在发展我国蒙古民族文化教育史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附注：

〔1〕特睦格图，为满语意为“痣”，因特睦格图右眼眉上有痣，由此得名。

汪睿昌字“印侯”，有的书上写“印候”，现据其亲友收藏汪睿昌生前遗物（茶杯）上书“癸酉夏月印侯监制”字样，应为“侯”字，非“候”字。

“印侯”取自《三国演义》“挂印封侯”之意。以上参阅汪睿昌：《新译带批三国演义》序和插图（“蒙文书社”1928年版）；《北京蒙文书社开创始末回忆录》，汪云腾（汪睿昌长子）、赛音卜合、玛希巴雅尔合写，未刊稿，1980年1月30日。另据内蒙古教育出版社吉木同志提供实物和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蒙古史研究所额尔登泰先生口述记录等。

〔2〕关于特睦格图的生年，有关文献记载不一（一八八七年，一八八八年，一八八九年），现据王云腾回忆

其父“故于1939年5月2日，终年52岁”，推断其生年应为一八八七年旧历十二月七日。

〔3〕贡桑诺尔布，是特睦格图创制蒙文铅字的积极支持者。字乐亭、号夔重，乌梁海氏，为元臣济拉玛二十八世孙，旺都特那木济勒长子。

〔4〕崇正学堂，在原内蒙古喀喇沁右旗王府，特睦格图少年母校，成立于一九〇二年。

〔5〕《蒙古大观》，财团法人善邻协会编，昭和十三年，第490页。

〔6〕顾盖侯：《蒙文铅字感言》，南京顾盖侯先生捐献本，未刊。

〔7〕白彦巴图：《汪睿昌和他创办蒙文书社》，《内蒙古文史资料》，第五辑，1965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8〕汪睿昌：《蒙文铅字说明书》，未刊，南京顾盖侯捐献本。第1页。

〔9〕汪睿昌：《蒙文铅字发明者的自述》（蒙文）。

〔10〕“农商部褒状”第一百四十一号，中华民国十三年八月十二日发给（1924年8月12日）。“教育部批”，授予四等三级文杏章，第三二号，中华民国十四年一月二十日（1925年1月20日）。

〔11〕白彦巴图：《汪睿昌和他创办的蒙文书社》，《内蒙古文史资料》，第五辑，1965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2〕据汪云腾、赛音卜合、玛希巴雅尔：《北京蒙文书社开创始末回忆录》，1980年1月30日，未刊初稿。

〔13〕据汪云腾：《蒙藏文活版铅字印刷创始人》，1980年1月8日，未刊初稿，该文指出，我国蒙、满、藏文铅字均为特睦格图创制。另据白彦巴图：《汪睿昌和他创办的蒙文书社》一文亦同样认为我国蒙、满、藏文铅字是汪睿昌首创。

〔14〕据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吉儒木图同志提供资料和汪睿昌著《蒙文书社出版书籍经典目录》（並附有书目提要）整理（蒙文）。

〔15〕《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序、编纂经过、人员一览表。民国二十三年三月版，开明书店印行。《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十五编、第一章，历任中央教育长官及委员、职官一览，总第1527页、1563页。

〔16〕吴鹤龄（梅轩），内蒙古喀喇沁右旗人，历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参事、蒙藏学校教授、蒙古驻京联合办事处处长、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蒙事处处长等职。一九二四年任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参事厅长、蒙古生计会会长。他协助特睦格图筹资把北京蒙文书社迁到南京。

〔17〕《蒙藏委员会公报、会令》，中华民国十九年十一月六日令。

〔18〕兴安军官学校，建于一九三四年一月，初在通辽钱家店，同年七月迁往郑家屯，一九三五年七月又迁往王爷庙（今乌兰浩特）校址，八月一日正式开学。汪睿昌被胁迫离南京任该校蒙文教授。任教期间，多次与日本教官冲突，引起校方注意。

〔19〕据作者访问内蒙古人委接待处赛音卜合同志材料整理。

〔20〕《蒙疆新闻社》，成立于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日，发行日文《蒙疆新闻》、汉文《蒙疆新报》、《晋北报》、《蒙古民声报》，蒙文《蒙古周报》（原为《蒙疆新闻》改），即汪霁昌北京蒙文书社设备迁到张家口后印刷的蒙文刊物。

〔21〕据佛鼎同志提供口述资料整理。

〔22〕《新蒙古》月刊，第四卷、第一期《蒙文读本问世露布》。

（摘自《中国蒙古史学会论文选集》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十五日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喀喇沁王组建的“燕貽堂”戏班

阎桂芳

喀喇沁部首领，系元朝功臣，他的后裔在清朝统一蒙古的战争中又建立了功勋。所以于康熙七年（1618年）晋“班达尔沙”为“多罗都梭郡王”，也就是喀喇沁部第一代王。喀喇沁王历代被封为“郡王”“亲王”。并把公主下嫁于喀喇沁王，即把端静公主（封号是和硕公主）下嫁于第三代王“噶拉藏”为妻。“贡桑诺尔布”的福晋（福晋是满语即夫人），又是肃亲王善耆的胞妹善坤。历代王爷与清朝有秦晋之亲。所以他们的地位高，权势大，是其它“扎萨克”无法比的。喀喇沁王模仿清朝宫廷也积极组建了戏班即所谓的“梨园子弟”。办戏班的企图有两条：一是向清朝皇帝献戏。在皇帝来承德避暑时，王爷带戏班去演戏，以表忠忱；二是演些帝王将相的剧目，启发教育蒙古民族向皇帝尽忠，为王公效劳，用潜移默化的手段，叫他们听命于封建统治阶级，做忠顺驯服的臣民；再次是清朝达官贵人来王府，也要演戏，以此表示自己对客人的殷勤和热情。故不惜代价，建立了所谓：“子弟班小班戏”，实际上是差民充当戏剧角色。主要是供上层封建贵族娱乐而已。

（一）燕貽堂：

“燕貽堂”是第十一代王旺都特那木济勒所建，地址在

王府院内东侧中间，也就是东大仓后院，建筑物宏伟豪华，“燕贻堂”的天棚是用正方形木板，描绘着一百个“寿”字装成的。每个字在写法上各有差异。字的四周都是蝙蝠图案。戏楼分为前、后台，舞台离地面只有二尺多高，午台前檐彩绘着草龙草凤的图案。正中有一长方匾额书“燕贻堂”三个金字。午台的对面是观戏楼（俗称看台），楼的前檐绘有各种花卉的图案。

“燕贻堂”是专为封建王公演戏的场所，绝对禁止平民、奴才们观看。

为了标榜王爷与庶民同乐，另建有“花园戏楼”是砖瓦结构，位置在王府花园，亦叫桑树园。唱戏时茶肆酒馆都开市，各种摊贩亦可进园出售商品。平民百姓允许进园看戏，但必须男左女右分开，禁止混同，以示王爷的教化。

（二）演员：

戏班成立时由北京请来两名艺人任教。旺王时期，演员多达四十多人，分大班、小班。都是用口传手教的方式，早晨学练唱腔，晚间舞台表演，只学一年即可出台演戏。

有的演员由于苦学苦练，艺术上有了很深的造诣，以至于蜚声艺坛。如：大西沟门的汪八月（汪福祿）是小班，学唱净角的，实际学的是架子花脸，唱“玉瑚坠”扮演马武出了名，人称他为“活马武”。也坐九龙口，打鼓有一定的技能。大牛群乡的阎老黑担任各种丑角，也有很大的名气。下瓦房村汪福祥的父亲是唱髯角的，怕挨打受骂，受不了王府约束，偷跑山西太原唱戏，在山西打了炮，轰动了太原一带，人们称他为“蒙古红”。后来到北京演戏，又被旺王叫回本旗。大西沟门的“扎拉僧太”（汉名

马万仓)，是唱刀马旦的，唱“无底洞”踩着寸子，无论唱腔、短打武工、马趟子都很过硬。

(三) 剧目：

王爷府戏班的剧目有二十几出。有水漫金山寺、王宝钏、胡迪骂阎、无底洞、忠报国、蝴蝶梦、打花棍、辕门斩子等。灯光、布景、效果，大部份用白酒、焰火。例如：唱胡迪骂阎，为了表达出阎罗殿的阴森气氛，和恶鬼的狰狞面孔用酒和焰火渲染，时明时暗时隐时现，给人一种恐怖的感觉。演水漫金山寺时，布景尤为精采，采用悬吊的方法，白蛇斗法海一场，确实显出水涨寺高的幻境。

这个专供蒙古贵族封建主娱乐的“燕貽堂”戏班，到一九〇三年才被贡王遣散。把戏剧服装、导具出售，其款做了毓正女学堂的经费。

喀喇沁旗王爷府 杀虎营子(四十家子)由来

阎桂芳

二百年前，喀喇沁王过着奴隶们百依百顺的封建主生活，但这并不满足其欲望。为了显示统治阶级的尊严和追求穷奢极欲的生活，在叶柏寿、砬碌科、海棠一带四十个爱里(自然屯)中选拔四十户强悍有力的蒙民，充当箭丁。搬到距王爷府衙门十华里地方居住，故称四十家子。

选拔的箭丁一是给王爷当亲兵(护卫兵)，允许每户盖三间房子，发给红契地十二亩(只有耕种权，没有出售权)，由王爷提供一匹乘马，专听王爷调用；其次是给王爷狩猎打前围。这支队伍专打黑熊、老虎等凶猛野兽。由三十人组成杀虎队，武器由王爷供应。打虎是有组织、有程序的，平时有七户为哈日鲁(实际是哨所)。经常上山寻查老虎的足迹，发现足迹，立即向王府报告。由参领、章京通知各牌头，在附近每个自然营子各摊派大狗一条，将狗用铁链子锁在老虎出没的地方。因狗哀鸣狂叫，引老虎吃掉狗后，就萎靡不振，酣睡起来，乘此机会，由王爷亲自下令通知杀虎队去狩猎。因打虎有生命危险，所以每家把打虎的火炮、扎枪、短刀等一类武器，都供奉在外间屋内。全年香烟不断，节日都准备丰盛的供品，初一、十五

都要点燃上海灯，以祈祷保佑，不被老虎伤亡。打虎队接到通知后，立即做好物质和思想准备，听见牛角号声，男的带上用荞面做的干粮（拌上红糖用火烧熟的）和二斤白酒，备好马匹在门前等候。家庭主妇，在供桌前拜揖叩首，双手托扎枪送到大门外，单腿跪下捧上武器，男的飞步上马而行。集中到王府敖包前点卯，接着五人为一组（分为火炮、扎枪、双叉、短刀等），对虎展开攻势。将打死的老虎抬到衙门前，让群众观赏。继之进行惩罚和褒奖仪式：先由王府内差亲兵将杀虎队成员，用黄布带子捆绑押到大堂候审（受审人必须穿上短衣，摘掉帽子）。堂官用严厉的姿态训斥一顿，大意是你们为什么打死山中之王，罪该受惩，先打四十蟒鞭，煞煞凶气。便用黄布裹着棉花做成的鞭子抽打，被打人假装疼痛，哭喊哀告。堂官命令押下去，随之退堂。戏剧性惩罚表演结束后，随之到二堂领赏。打老虎者必须衣着整洁，有官衔的带上顶带花翎。发奖的一般是由协理或梅林坐堂。将死虎抬至堂前接受长官的验收。受赏人双膝跪下请安，说明打虎的经过，表明自己的勇敢并愿向王爷效劳等等。听完后，先赏三杯酒，受奖人当场喝下，然后赏些银钱、物品和一张红契牌子（地契），恩赏六亩地。例如：现住杀虎营子孟庆珍的曾祖父、姚田富的曾祖父二人杀死老虎两只，被恩赏东西园子土地十二亩。把打死的老虎给王爷进贡。

打虎是一种冒着生命危险的行为，有时和老虎劲斗，甚至伤亡。例如：本村白俊海的曾祖父，因打虎被老虎咬死。由于四十户蒙民都是王爷的打虎队，所以本村又称“杀虎营子”。

狩猎分为小型和大型两种，前文叙述的是小型。大型

要集中三百余人，由王爷亲自带队指挥，四大梅林、八大参领、章京都要随从，大部份在秋末冬初，时间一——三天，按获得的猎物赏给奖品，猎物全被王爷无偿夺去。

龙泉寺简介

郑瑞峰

龙泉寺位于喀喇沁旗锦山镇西北山中。从锦山西面山沟往西行约二公里即达龙泉寺沟口。在此可见半山腰处红墙紺宇，古柏参天的一所寺院就是龙泉寺。当人们进入山谷之中，春夏季节树木成荫，野花异香，路经曲径进入寺院。古寺建于海拔一千二百米的狮子峰脚下，此地山势环抱，峰峦竞秀。寺殿依山势而建，高低层迭，大体呈三进三阶型，整个布局严谨、对称。前有山门，中有天王殿，东西两侧建有配殿，最后大殿面阔三间系歇山重檐建筑。四周有围廊，殿前台基边缘修有石刻勾栏。阶下有一大型石狮，身长四点五米，头高一点一米，昂首西南，作屈卧状，其形态生动逼真。这只狮子虽不及河北省沧州大铁狮子那样有名；但在全国并不多见。这石狮子不是平常人们可以搬得动的石刻，而是就一块自然岩石在原地着意刻成的。

寺内留有两方元代古碑，一块小碑上刻：“大元国上都路松州南阴凉河川狮子崖龙泉寺常住山林地土周围四至碑”。这块碑是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公元一二八七年）重修寺院后，对寺院所属山林地土范围进行明确说明。东西南北各长五里，此碑立于狮脊之上。另一方大碑，立于元顺帝至正元年（公元一三四一年）其碑文叙述元初以

来，自西安咸宁张智然大师到此，如何在前寺之上除瓦砾，剪荆榛、修山门佛殿、厨库僧舍以及兴庄田山林水碾以供寺僧日用的道行碑。碑文还刻写了这里山明水秀，境物幽深，信徒沓至，无不**起宿缘之念的入胜情景**。此碑虽距今已六百余年，但保存完整，螭首，龟趺均全，雕刻精巧细腻，花纹别具匠心，碑文共一千二百五十字，依然清晰如新。

寺后北侧山崖上有一小石窟，高阔二米，深一点五米，内有石佛二尊，表面已风化剥落。

寺后西侧约十五米处，有古井一眼，春秋季节水盈外溢，常年不枯，龙泉寺即此而得名。

龙泉寺的兴盛时期是元、明、清三代。康熙三十七年七月，清朝皇帝康熙平定噶尔丹叛乱回盛京（沈阳）告祭，驻蹕喀喇沁驸马府时，还专程到龙泉寺焚香拜佛。临行时並赐给本寺一具金鞍玉辔和弓箭等物。可惜的是原来西配殿和后大殿数以百计的精细塑像，已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洗劫。现存的石狮和两方元代古碑保存完整，是我旗的重要历史文物。它为研究元代历史、地理提供了珍贵资料。

石狮脊立石碑碑文

大元国上都路松州南阴凉河川狮子崖龙
泉寺常住山林地土周围四至碑东至只峪岭五
里南至分水岭五里西至柳河峰六里北至平台
六里

石碑时更久 兴隆梵刹昌
常存千载固 损坏现招殃
至元二十四年月日重修

开山创建龙泉寺 第一代祖智然律师道行碑

松州狮子崖龙泉寺住持慈光普济大师然公道
行碑

涂 阳

石匠韩紫端并弟韩子春 同造
大宁路东观音院住持长老东明挥
吉祥 撰

嘉议大夫中书礼部尚书赵大鞏
题额

道非道於滅興象安之少年少雪兼园堂龙境庵拔兽公
道流化殄迭界乃溪之子年尝冰行梁开至秀草餘鸟持
弘其教神诸祖沙峰灞此一龕礼莹挂於嗣四年明水乃结
能而声施世法周崇字然居惟此韶暮律不山是祐地山就
无竺届广间坤法然智世自在器参戒丝名於延此缘已间课
人西远圣师乾坤智世自在器参戒丝名於延此缘已间课
匪於二更光耀师讳遁得非凡朝坚守寸游历之於祐地山就
人灵二后今师名得非凡朝坚守寸游历之於祐地山就
其诞法矣迨今公逃溪父母髮受具守三衣游历之於祐地山就
乎如来兴服者张公浪父髮受具守三衣游历之於祐地山就
存如摩而仰道父张公浪父髮受具守三衣游历之於祐地山就
今摩而仰道父张公浪父髮受具守三衣游历之於祐地山就
隆人故摩而仰道父张公浪父髮受具守三衣游历之於祐地山就
大教显其人故摩而仰道父张公浪父髮受具守三衣游历之於祐地
无以显其人故摩而仰道父张公浪父髮受具守三衣游历之於祐地

见师道行孤高学材深广让师为主避席而去不
数年间山门佛殿克日落成厨库云堂方丈僧舍
轮焕一新莫不丹青斗彩金碧争辉灿然眩目又
於寺侧盖水碾一轮所得碾课供给斋饭东西二
庄农具息备至於雕木佛像彩画圣容金饰寿牌
印造大经百法等论及诸品经文应用什物无不
全美开常讲二十余期建水陆三大胜会放生类
一百余口然而德被禽鱼名闻朝野敬受帝师法
旨特赠师号光贲林泉化缘已毕世寿告终於后
至元己卯仲夏八日无病而逝就於寺侧性火闍
维祥光满室瑞彩腾空至於烟减灰飞凝然不散
剃度者五十余众承嗣者三十余人世寿七十三
法腊五十五越明年腊月神足月公律师行状诣
予而言曰吾师存日坚守律仪行业涓洁创建寺
舍其行甚夥今已圆寂恐岁月浸曩久湮没吾师
之绩欲立石以永其传丐缀文愚赏於年曾预讲
席於圆宗闻师阐扬玄义兼善毗尼及奉戒严洁
慈让谦和克古神清世无并者虽清风明月不足
比其精华古柏寒松岂能同其雅操月公所请欲
拒不能恨无大材不能尽其形容矣故序其要后
系铭曰

然师硕德 僧中轨则 妙小辞亲 屏缘后释

受具近圆	过中不食	举措施为	不遣法律
行之无染	如雪如霜	德之不动	如山如石
其誉洋洋	其声历历	狮子崖高	崇峰遁迹
剪剃荒芜	去涂荆棘	缔构茅庵	以全栖息
山灵宿卫	虎狼远辟	性智坚明	邪徒莫抑
历数年间	一心不易	士俗归崇	助缘竭力
堂殿峨峨	廊庑翼翼	众屋具备	焕然金碧
化缘已就	世寿告毕	净识俄迁	奄然归寂
性火阁维	光耀五色	瞻之仰之	嗟叹无极
高弟月公	孝义不忒	勒碑刻铭	述师之绩
万古巍巍	德风不匿		

至正元年岁次辛巳五月建嗣法本寺住持
 花严经讲主了然小律师□显月书丹□立石□
 □门资□明讲主材讲主道果道和道普道亨道
 定道臻道惠道净道宁寺主道因道昶道源道忍
 道隐道海道远道荣道进
 教读觉忠提点德洪道广道永道昌道用庄主道
 忠道腾道泰□□法孙□讲主德行德遇德端德
 义德显德缘德悟。

赞龙泉寺诗文

郑瑞峰供稿

龙泉寺建于元代之前距今约有千年，是我旗最古老的寺庙之一。位于锦山西北山中，这里群山环绕，风景幽美宜人。正如碑文所载：“此地前临峻壁，后列峭崖，龙蟠虎踞，诸峰星拱，春夏则花木幽香，秋冬则松云静翠，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另一方元碑也载到：“此地山明水秀，境物幽深，似与尘世相隔”。因此这里吸引着各代的文人墨客来此地游览，並吟诗作画，均对此地赞赏不绝。近几年我收集到十多篇描写龙泉寺的诗文附后供读者欣赏。

（一）咏龙泉

如许主人作

峰峦四面水涓涓，古寺深林翠接天，
曲径登来攀鸟道，清音响处汲龙泉，
闲云阑空空留色，野鹤窗前半语禅，
游罢人归几回首，钟声散入夕阳烟。

（二）秋日再游龙泉寺

如许主人作

古寺深林曲径幽，浮图高耸碧云收，
人来梵宇双眸豁，我向龙泉两度游，
松树窗前遮晓日，莲花池上带新秋。
山僧地是多间味，风月天边任自留。

（三）秋日游龙泉寺

寺秘云山里，人行古径前，
烟霞寻鸟道，石磴泻龙泉，
谷口枫将老，溪头水自鲜，
钟鸣黄叶地，客话夕阳天，
雁阵排残照，蛩青伴静禅，
风凉精舍外，木落梵宫边，
云影晴空薄，松声法界传，
归来斜日晚，一路听寒蝉。

抄于《公余集》

（四）暮秋重游龙泉寺

重向空山谒法禅，踏残落叶九秋天，
幽林瑟瑟环云岫，雅韵潺潺泻石泉，
皓月临时尘虑净，仙风吹处梵音传，
清声满耳松涛起，峭壁悬崖水滴涓。

抄于《公余集》

（五）新秋游狮子崖龙泉寺

山峙岩堯倚翠微，禅关四面绿荫围，
深林策马僧遥接，曲径扬鞭鸟共飞，
狮洞临崖云漠漠，龙泉泻流雨霏霏，
残碑摩罢思无限，一路斜阳送客归。

抄于《公余集续编》

(六) 初秋同游龙泉寺即景

山灵钟秀佛留缘，古刹初瞻宝相圆，
十里绿荫通曲径，一渠流水溯清泉，
参禅曾悟前身月，掉锡应齐老鹤年，
最是小亭峰四面，纳凉人在洞中天。
一子勤一

(七) 原韵

来游梵宇悟前缘，古木高擎似盖圆，
霭霭红霞生鹭岭，涓涓流水出龙泉，
巢松野鹤无惊意，人定山僧不计年，
一路虫音兼磬韵，同归人趁晚凉天。
一景璞一

(八) 原韵 如许主人作

古刹清幽涤俗缘，喜逢正转法轮圆，
千峰拥护堆青嶂，一水回环泻碧泉，
寄迹深林尘似洗，栖心静昼日如年，
更听梵磬敲云外，方信人间别有天。

(九) 夏日游龙泉寺

深山策马涤尘情，纵翠峰恋面面迎，
古木葱菁难问路，野花馥郁不知名，
崎岖鸟道车前壘，曲折龙泉眼底清，
自是三江多胜概，也将塞景结诗盟。
抄于《公余集续编》

(十) 龙泉寺谒净修禅师得句

策马驰驱石径斜，白云深处隐僧家，
林中犹覆经冬雪，谷口还开向暖花，
听罢三乘思法炬，装成七宝灿烟霞，
泉声入耳尘心净，归路吟诗兴倍加。
抄于《公余集续编》

(十一) 咏 龙 泉 寺

龙泉宝寺景最幽，峻岭重山秀千秋，
佛殿重修元世代，神宫补造古松州，
笑看狮崖身伏卧，欣赏龙泉水自流，
圣祖出巡临幸地，遗得金鞍作念头。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喀喇沁旗文史资料第一辑

作者 =

页数 = 1 2 0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目录
正文